

修志问道 以启未来

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4月19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存史、育人、资政,做好编修工作十分重要。五年来,全国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执着守望、辛勤耕耘,地方志工作成绩斐然,这项事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谨向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希望你们继续秉持崇高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以求真存实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目 录

卷首语

李克强：修志问道 以启未来 (1)

特载

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 (4)

刘延东：与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部分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6)

王伟光：发扬成绩 谋划长远 奋力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 (9)

历代名人与西安

杨良瑶——充满传奇色彩的唐代外交官 (12)

学术交流

浅议年鉴索引的编制 曹毅强 (14)

人物春秋

马甫甫先生其人其事 封五昌 (17)

史料钩沉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8)

中国历史上两次国共合作暨启示 (19)

孱弱晚清为何屡次援助他国 (21)

中国古代后宫的女官制度 (22)

西安风情

西安城门趣闻(六)——和平门 (24)

西咸新区空港新城 (26)

我们的村落

南张家庄村 (27)

北张家庄村 (29)

三府湾村 (3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户县北乡锣鼓 富小云整理 (34)

文史拾趣

中国古代帝王大都有写诗癖 (37)



西安地方志

2014·第3期

(总第228期)

陕新出连内印字第00016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宋代冗官为何多?	(38)
中国的皇帝为何喜欢查户口	(40)
孔子有时也说谎	(42)
宋朝为什么有那么多黑店	(43)

志鉴动态

省地方志办公室巡视员焦博武一行来西安调研地方志工作	(44)
西安市第二轮修志工作分类培训会召开	(45)
《西安通史》启动仪式暨初稿研讨会举行	(46)

知识窗

大家闺秀与小家碧玉区别	(47)
“南墙”是什么墙	(47)
“杜撰”与“杜”姓	(48)
房东的东是何意	(48)
死党原来是个褒义词	(49)
“牺牲”为何特指为正义献身	(50)
建都西安第一个建立四字年号的皇帝	(50)
西安古代后妃中第一个有谥号的人	(51)

历代诗人咏长安

国风·秦风·蒹葭——《诗经》	(52)
----------------------	------

解字

“争”	(36)
“皮”	(49)

名句欣赏

【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等五句	(8)
----------------------------------	-----

文苑

西安地铁赋	姚敏杰 (54)
群公诗咏西安地铁	刘炜评 赵安志 王 锋 彭世团 吴 嘉 郭冀宁 马河声 怀玉堂 周谊平 奇 奇 王小凤 王彦龙 张世民 (55)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 任:冯艳阳

副主任:姚敏杰 任昆明 张 帆
王 莹

委 员:崔义萍 杨军亚 彭栋为
高长安 姚文东 崔桂琴
富小云 张 耀 高 鹏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 编:姚敏杰

副 主 编:高长安 宋亚颖

责任编辑:何彩云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凤城八路 109 号市政府
大院 26 号信箱

邮编:710007

西安地情网:www.xadqw.cn

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基础数据库

<http://125.76.215.234:8080/difangzhi/>

E-mail:changannan6861@sohu.com

电话:029-86788731

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

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4月19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存史、育人、资政，做好编修工作十分重要。五年来，全国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执着守望、辛勤耕耘，地方志工作成绩斐然，这项事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谨向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希望你们继续秉持崇高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以求真存实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与部分会议代表座谈。她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精神，进一步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

刘延东指出，地方志工作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有着悠久璀璨的历史，有着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连绵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为传承文明与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承担着传承文明、记录历史、弘扬文

化、服务社会、借史鉴今、启迪后人的光荣使命。

刘延东强调，要把地方志作为重要的文化基础事业切实抓好。要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管理和发展地方志事业的重要职责，发挥地方志工作机构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等职能，提高工作水平。要进一步加强质量管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化对地方志工作规律和特点的认识，打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佳志。要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当中，加快方志馆、地情网站、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建设，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利用地方志、传播地方志，鼓励和倡导全社会“读志”、“传志”、“用志”，用历史的智慧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王伟光出席会议并作工作报告。王伟光说，李克强总理的批示和刘延东副总理的讲话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对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是巨大的鼓舞，对地方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一定要认真领会并贯彻落实。

王伟光指出，五年来，地方志事业发展呈

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要保持和发展这一局面，必须认清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改革大局，抓住和用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当前，地方志事业发展又面临着大好形势与机遇：一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构筑了广阔舞台；三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地方志事业发展处在一个崭新的起点上，亟需乘势而上、顺势而为。

在总结成功经验和科学研判地方志事业发展新形势的基础上，王伟光提出地方志事业未来发展的奋斗目标，并部署今后五年地方志工作的主要任务。他表示，到2020年，我们完全有信心建成由地方志编修体系、地方志质量保障体系、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地方志理论研究体系、地方志学科建设体系、地方志工作领导体系、地方志人才队伍体系、地方志工作物力财力保障体系组成的，比较完善的地方志事业发展综合体系，推动地方志工作和方志文化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迈上一个大台阶。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李培林在会上作《关于〈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4—2020)〉(草案)起草的说明》。中央档案馆馆长、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杨冬权布置全国地方志系统表彰先进工作。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

长何雷主持会议。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军、武警部队、计划单列市的分管领导和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人，以及国务院部委局史志机构代表参加会议。

据介绍，从2008年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至今，全国地方志工作取得诸多喜人成绩。首轮修志任务全面完成，全国累计出版规划内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5900多部；第二轮修志工作深入展开，部分地区已完成修志规划任务。年鉴编纂与旧志整理工作成绩斐然，目前，全国地方志系统组织编纂的地方综合年鉴1700余种，专业年鉴1200多种；全国地方志系统累计整理旧志2000多种，为抢救保护地方历史文献和加强全国古籍整理工作作出积极贡献。此外，方志理论和方志学学科建设、地方志系统设施设备信息化建设、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地方志工作机构与队伍建设以及地方志工作法治化建设等，皆取得新进展。五年来，我国初步形成了由制度保障、工作成果体系、事业发展格局、共同价值理念等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志文化。



刘延东：与第五次全国地方志 工作会议部分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召开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这是地方志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刚才听了伟光同志的情况汇报，感到很受鼓舞。首先，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在座的各位并通过你们向全国广大地方志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地方志是传承和彰显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瑰宝。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2月25日考察首都博物馆时强调，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李克强总理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专门作出重要批示，他指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存史、育人、资政，做好编修工作十分重要。五年来，全国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执着守望、辛勤耕耘，地方志工作成绩斐然，这项事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谨向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希望你们继续秉持崇高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以求真存实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

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的重要讲话和批示深刻阐述了做好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意义，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立意高远、催人奋进，对地方志事业和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过去五年，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指导下，经过全国广大地方志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地方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地方志工作的法治化、制度化建设不断完善，逐步进入依法修志的新阶段；二是首轮修志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阶段性成果明显，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修志规划任务；三是年鉴工作发展迅速，五年共新创刊地方综合年鉴400多种、专业年鉴200多种；四是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成果丰硕，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日益提高，社会认可度和参与度不断提高；五是地方志工作机构与队伍建设不断优化，整体素质明显提升。地方志工作及其成果，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

悠久璀璨的历史。连绵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为中华文明代代相继、血脉相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意义十分重大。下面，我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精神，进一步做好地方志工作，提四点希望：

一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部署。“方志乃一方之信史”。地方志全面翔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绵延辉煌的悠久历史，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谋求民族独立解放、国家繁荣昌盛的奋斗历程，记录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既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也能体现现代文明与历史文明的一脉相承，特别是能够更好地凝聚人心，提升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对实现“两个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各地要从战略全局高度重视和加强地方志工作，将其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来抓，进一步推进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

二要进一步明确相关职责。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地方各级政府管理和发展地方志事业的重要职责，切实做到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位、设施到位、规划到位、工作到位，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要进一步发挥各级地方志工作

机构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等职能，动员和组织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地方志事业；要把解决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紧密联系起来，从地方志工作和事业发展的要求出发，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进一步提高工作水平，推动地方志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要进一步加强质量管理。地方志不同于一般的研究论著，确保质量至关重要。地方志质量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根基所在、活力所在、价值所在。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要通过地方志全面系统、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坚决反对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要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原则，认真总结修志经验教训，深化对地方志工作规律和特点的认识，以科学认真的态度，精益求精的学风，将质量意识贯穿于修志工作的始终。不仅要全面真实反映历史发展脉络，还要充分展示历史细节。要结合发展的新形势，加强对地方志包括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乡镇村志编纂的业务指导和服务，综合运用执法检查、行政督察等手段，完善资料报送、志稿评审、质量评价、审查验收、批准出版等制度，打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民族的系列精品佳志。

四要进一步强化开发利用。“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地方志是一座巨大的文化宝库，是各级党政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熟悉地情，了解地方发展历史的重要载体。开发利用地方志要与实现“三个自信”结合起来，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特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各地要自觉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当中,加快方志馆、地情网站、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对地情文献资料的专门研究,重视地方志资源的普查摸底,开展数字化、网络化建设,做好地方志资源的整合、共享与开发利用。各级领导干部要“读志”、“传志”、“用志”,“究兴衰之由,陈利弊之要,补救时政之阙失,研求民生之荣枯”,用历史的智慧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发挥优势,创新服务手段和方式,拓宽服务渠道,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利用地方志、传播地方志。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是一篇大文章,比如教育系统应当鼓励全国青少年阅读地方志,有些地方志内容应纳入当地中小学教材或课外读物,把当地历史上有特色的东西挖掘出来,让每一个出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不能忘记祖宗、忘记历史。地方志开发利用水平是衡量地方志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不要把地方志工作变成单纯的事务

性工作,要学以致用、修以致用。现在文化产业异军突起,可以按照地方志记载的内容编些动漫作品,出一些普及性、趣味性读物,还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宣传。地方志应该是严谨的资料性文献,但是传播地方志的形式和方式应该是生动活泼的。地方志开发利用做得越好、推广得越多、运用得越广泛,地方志工作的现实意义就越重大,贡献就越大。

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承担着传承文明、记录历史、弘扬文化、服务社会的光荣使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进程中,地方志工作大有可为。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扎实持续有效开展有关工作,努力开创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报》)

·名句欣赏·

【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韩非子·观行》

须眉:胡子和眉毛,指面容。迷惑:是非。

【道虽贵,必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孔子家语·致思》

时:时机。势:形势。

【草木无大小,必待春而后生;人待义而后成】——《尸子卷下》

【不在逆顺,以义为断;不在憎爱,以道为贵】——《后汉书·刘梁传》

【富贵之多罪,不如贫贱之履道】——《抱朴子·广譬》

履道:实行道义。

王伟光： 《发扬成绩 谋划长远 奋力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

在2014年4月19日于北京开幕的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在《发扬成绩 谋划长远 奋力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的主题报告中，总结了自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至今的五年时间里，在全国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地方志工作者的辛勤耕耘下，我国地方志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修志工作取得系列重大成果。

王伟光指出，自2008年11月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至今，首轮修志任务全面完成，全国累计出版规划内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5900多部。首轮修志硕果累累，开创了我国方志编修的崭新局面，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的壮举，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盛事。

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深入开展，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修志规划任务，其中广东省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五年来，全国出版规划内三级地方志书1000多部，累计出版1400多部；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编修成果丰硕，累计出版2万多部；乡镇志、村志编修方兴未艾，累计出版4000多部。水利、

海关、铁路、民航、气象、煤炭、石油、烟草、文物等系统的修志工作稳步推进。全军第二轮修志任务基本完成，启动军事大事记和《中国军事地理志》《中国边海防志》编纂工作。武警部队积极推动第二轮武警志编修工作。受国务院委托、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牵头组织编纂的《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支持和全志编委会、各分卷编委会的有力领导下，经过近百个参编单位几千名编纂人员共同努力，完成全部11卷约1500万字的编纂任务，即将交付出版。

年鉴工作快速健康发展。五年来，各地新创刊地方综合年鉴400多种、专业年鉴200多种；上海、江苏分别出版《上海年鉴》《江苏年鉴》英文版。我国是世界年鉴编纂出版大国。目前，全国地方志系统组织编纂的地方综合年鉴达1700余种，还有包括军事年鉴、武警年鉴在内的专业年鉴1200多种，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湖北、广东、海南、四川等省（直辖市）基本实现县级以上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全面覆盖。全国地方志系统共发表年鉴论文800多篇，出版著作、论文集10余部。

旧志整理工作成绩斐然。

●特载●

五年来,全国地方志系统以点校、注释、影印、复印、扫描、原版复制等方式,整理旧志 700 多种,累计整理 2000 多种。其中,广东省全部完成旧志搜集整理,出版了《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北京、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河南、四川等省(直辖市)大规模集中整理旧志并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抢救保护地方历史文献和加强全国古籍整理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方志理论和方志学学科建设迈出新步伐。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编写出版《中国方志通鉴》《当代志书编纂教程》,启动并有序推进《方志百科全书》编纂工作,努力创建方志理论的概念体系和方志知识体系;积极开展对港澳台和对外学术交流,举办新方志编纂论坛,研讨交流方志理论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以《中国地方志》期刊为纽带,召开全国方志期刊工作座谈会,充分发挥方志期刊的理论阵地和引导作用。中国地方志学会建立学术年会制度,举办三届针对性较强、影响较大的学术年会,较好地发挥了学会的学术引领作用。学会城市区志专业委员会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推动城市区志理论研究。各地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地方志学会积极举办法学年会和理论研讨会,设立专项研究课题,组织优秀论文评选,编辑出版论文集,激励广大地方志工作者开展理论研究。五年来,全国地方志系统共发表方志论文 6000 多篇,出版专著、教材、论文集 40 余部。

方志学学科建设取得新进展。指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召开《方志学学科建设规划》研讨会,与暨南大学合作举办法志学方向研究生进修班。复旦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宁波大学

等高校继续招收培养方志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在地方志系统、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形成一支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方志专家队伍。

地方志系统设施设备信息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指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全国地方志系统信息化建设经验交流会,设立信息化建设试点单位,实施中国地方志网、《中国地方志》期刊网、志书和年鉴数据库建设工程,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合作开展中国历代方志数字化工作。各地积极建设地情网站,五年来,新开通省级网站 7 个、市级网站 80 多个、县级网站 200 多个。目前,全国省级网站达到 26 个、市级网站近 200 个、县级网站 470 多个。山东、广东等省加快省、市、县三级地情网络群建设,实现全省联网、资源共享;一些地方与政府门户网站、图书馆网站实现链接,公共服务能力大大提高。许多地区加快地方志成果数字化速度,不断完善地情资源数据库,将海量电子资源上传到地情网站,供社会各界查阅使用。

各级方志馆建设加速推进。五年来,国家方志馆建成,新建省级馆 7 个、市级馆 20 多个、县级馆 80 多个,一些地区的方志馆已获准立项或正在建设中。全军军事志馆建设在逐步推进中,中国武警史馆建成开馆。目前,全国已建成国家方志馆 1 个、省级馆 15 个、市级馆 60 多个、县级馆近 200 个。随着方志馆的陆续建成,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千方百计丰富馆藏资源,并陆续向社会公众开放,展示地情、提供服务。

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开创新局面。各地地方志工作机构积极开展地情研究,编写地

方简史和志书干部读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广东等省创办资政刊物,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参与规划编制、旅游开发、招商引资、历史文化遗产发掘保护、防灾减灾等方面的工作,努力将地方志工作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利用地方志资料,编纂出版反映重大事件、历史名人、特色产业、重要物产等方面的地情资料和地情书籍,深度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十集电视纪录片《方志·中国》,并在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启动方志蓝皮书《中国方志文化发展报告》编写工作,努力扩大方志文化的影响。各地与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站等媒体合作,宣传地方历史文化和方志文化;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其中《吉林年鉴》编辑部与新闻媒体联合持续组织“感动吉林”年度十大人物评选活动,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中国红辛亥革命百年祭》,举办“喜迎十八大、中国红巨幅国画展”,积极营造昂扬向上的舆论氛围。

地方志工作机构与队伍建设取得新成绩。领导小组办公室多次举办修志主编培训班和地方志工作机构新任负责人培训班,联合开展当代中国史和口述史专题培训。各地通过相互交流、出国出境考察学习、专题培训、举办讲座、与高校联合办学、以会代训等方式,对主编、总纂、编辑、组稿人员、撰稿人员等开展针对性强、内容丰富的业务培训,努力改善队伍知识结构,提高队伍整体素质。为稳定机构与队伍,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配合各地和主管部门,积极推进地方志工作机构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范围;争取到中央编

办的有力支持,明确领导小组办公室不参加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开展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活动,同时又单独开展全国方志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评选活动。各地先后与人事部门联合或单独开展了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活动。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表彰了修志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地方志工作法治化建设深入推进。五年来,又有山西、内蒙古、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河南、海南、云南、甘肃、新疆等 1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修订了《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目前,全国已有 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50 多个市、县颁布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或政府规范性文件。有些部门和行业制定部门志、行业志编纂工作规定,人民解放军将《军事志工作条例》列入中央军委立法计划,武警部队出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史志工作规定》。河北、山西、吉林、江苏、山东、河南、湖北、广西、贵州、甘肃等省(自治区)开展人大执法检查或政府督察,沈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等取得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强化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的权威性,有力地推动了地方志工作的健康开展。





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
外交使节杨良瑶

杨良瑶

——充满传奇色彩的唐代外交官

郑和下西洋的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郑和下西洋之前 600 余年的唐德宗贞元元年(公元 785)四月,有一人曾受命出使黑衣大食(西亚一带),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第一位航海抵地中海沿岸的外交使节。此人名叫杨良瑶(公元 736—公元 806),陕西泾阳人。

关于杨良瑶受命出使黑衣大食之事,过去的正史中并没有记载。这段历史被揭开,还要归功于 1984 年的一次考古发现。

《泾阳县志》这样记载“碑于 1984 年 4 月在扫宋乡小户杨村西北 100 米处出土。现存县博物馆。碑建于元和元年十月十四日癸酉。碑首有六螭相交,螭首于碑之两侧下垂,圭片上篆“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九字。碑首高 0.85 米,和碑身相连。碑身有收分,上宽 0.94 米,下宽 1.02 米,上厚 0.24 米,下厚 0.27 米。碑高 1.90 米。碑身正面有倒角,两侧线刻蔓草花饰。碑文记叙杨氏家族起源,侍奉皇帝,内平祸乱,外抚异邦及杨良瑶以朝廷使节身份

携带国书,由南海起航,跨越印度洋,访问远在两河流域的黑衣大食(即阿拉伯帝国的东方部分)等情况”。

那么杨良瑶为什么要从海路出使黑衣大食?这得说说当时的情况。贞观八年至二十三年(公元 634 至公元 649)可以说是唐蕃关系发展的良好阶段,其特点是和好关系的建立,并因文成公主的和亲而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是,在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相继去世之后,其后长达 170 年间,唐蕃关系呈现着矛盾争斗与和好往来交织的复杂局面。安史之乱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至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 762)结束,前后达八年之久。使唐朝的实力大受影响,其对外控制力也相对削弱。吐蕃政权趁机大肆向外扩张,广德元年(公元 763),吐蕃陷凉州,陇右、河西诸郡大部分地区为吐蕃所占,安西四镇和伊、西两州、北庭等地与中央政府联系被切断。建中二年(公元 781),沙州失陷,西域更处于不利境地。虽然回纥助唐抗吐蕃,并开通了“回纥”路,但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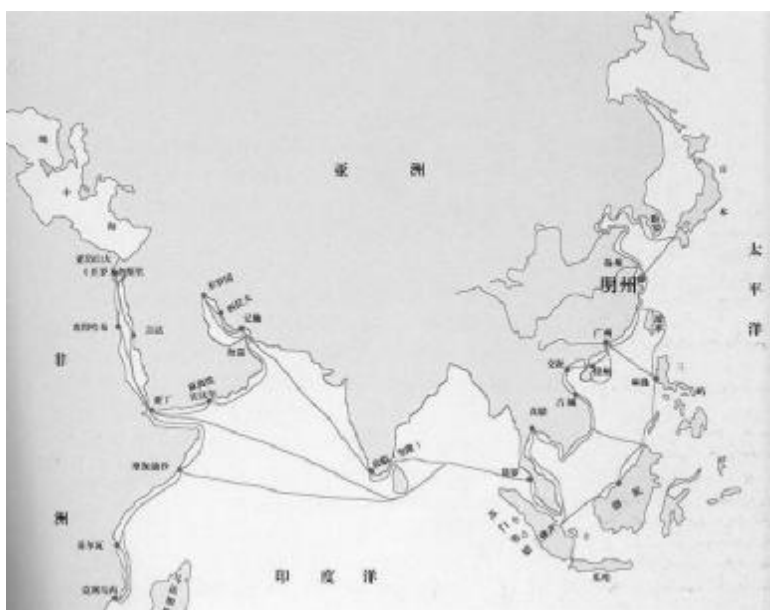
未完全扭转唐在西域与吐蕃争斗中的劣势。因此,原有的丝绸之路被隔断。时任宰相李泌制定了“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外交政策。当时大食与唐朝一直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而大食与吐蕃关系也比较紧张,所以唐朝希望与大食结盟,共同对抗强大的吐蕃。于是,公元 785 年,年满五十的杨良瑶受命为聘国使,携带国信诏书,从广州出发,走海路出使南亚和黑衣大食,历时三年。

关于杨良瑶出航的路线没有具体的史料记载,但其同时期著名的地理学家贾耽所著《广州通海夷道》一文记录下了一条从广州通往东非的航线,即自南海出航,越海南岛东南,沿南海的印度支那半岛东岸而行,过暹罗湾,再西出马六甲海峡,经尼科巴群岛,横渡孟加拉湾至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再沿印度半岛西岸行,过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抵波斯湾头阿巴丹附近,再溯幼发拉底河至巴士拉,又西北陆行千里至(底格里斯河畔的)阿拉伯都城巴格达。虽然缺乏具体的史料记录,但相信杨良瑶出航的路线应大致与这条航线吻合。

杨良瑶的出使,客观上促进了唐代的海上贸易,同时也使来自吐蕃的压力相对减小。《新唐书·大食传》中的记载:“贞元中,与吐蕃为劲敌,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可见杨良瑶下西洋的任务顺利完

成,不但成功出使黑衣大食,同时也对古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没必要牵强附会。但事实是,随后由于种种原因,吐蕃王朝开始衰落,为了巩固王室的统治,于是与唐朝建立了新的友好关系。公元 821 年,赞普赤热巴巾接连三次派员到长安请求会盟。唐穆宗也因势而为,命宰相等 17 名重要官员与吐蕃会盟官员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派刘元鼎等人到吐蕃寻盟,与吐蕃僧相钵阐布和大相尚绮心儿等人结盟于逻些(即拉萨)东郊。这次会盟发生在唐长庆元年和二年,史称“长庆会盟”。会盟双方重申了历史上“和同为一家”的甥舅亲谊,决心今后“社稷如一”,永远和好,互相援助,充分表达了藏汉两族人民要求友好相处的共同愿望。长庆会盟之后,藏汉两族团结友好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

浅议年鉴索引的编制

◎ 曹毅强

“索引”这个名称,是辛亥革命后从日本传中国的。中国古代曾有“通检”、“备检”、“韵编”等词,这些都是索引的旧称。索引的另一个别名叫做“引得”,是英语“index”的音译,意思是“指点”,原出于拉丁语“Indiae”。顾名思义,索引是引导人们去检索所需资料的工具。

《辞海》注释,索引即“将图书报刊资料中的各种事物名称(如:字、词、人名、书名、刊名、篇名、内容主题名等)分别摘录,或加注释,记明出处页数,按字顺或分类排列,附在一书之后,或单独编辑成册,称为索引,是检寻图书资料的一种工具。”

一、年鉴索引的性质、类型及特点

年鉴是一种资料密集型的工具书。它按年度出版,概述或反映某一地区、某一领域或某一专业的发展概况,记录的是最新事实和最新成果,往往还汇集了大量的图片和统计图表。中文的年鉴有专业年鉴如图书出版年鉴、统计年鉴、工业年鉴、经济年鉴等等类型,另外还有综合年鉴——地方年鉴。因而,在信息社会,年鉴是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

(一)年鉴索引的性质

1.是年鉴信息内容的检索工具

年鉴索引的对象是年鉴的信息内容,是抽取年鉴中能够反映某个或某些主题的标引词,按某种顺序单独排列并附上页码供用户查找。用户可以按图索骥,不必系统阅读全文,大大节省时间。

如果说年鉴是一个信息库的话,那么索引就是一把打开这个信息库的钥匙。一部年鉴篇幅往往在百万字,系统阅读的话,费时费力。再者,由于年鉴是资料性工具书,信息内容涉及各个学科领域,具有特定信息需求的读者,往往是出于某种检索需要就某一个或几个主题而有意识或有目的地从中查找自己感兴趣的资料,不必通篇阅读。而索引正好具备这个功能,能够提供这个“大部头”的主要内容线索,用户通过索引能够快捷地找到所需资料。

对于每一部年鉴来说,索引通常置于书后,是图书内容索引的范畴。对于年鉴内容,可索引的范围十分广泛,只要用户感兴趣的有价值内容的部分都可以索引,如图、表、条目、人名、地名、机构名等。但是那些不包含实质性内容的部分,如目次、凡例、书名页等不应列入索引范围。

因此,年鉴索引揭示的是信息内容,是用户快捷便利地查找所载资料的检索工具。

2.是工具书之工具

年鉴是工具书,而且不是一般的工具书,具有收录广泛、内容概括、信息密集、资料浓缩、编排特殊、功能齐全等一系列特点,是用户查找资料,解决疑难的重要工具。而年鉴的主要部分是条目(统计年鉴的表格重要性等同于条目),可读性差,资料性强,工具性是第一位的,阅读性是第二位的。而索引是检索工具,因此年鉴索引的实质是工具书之工具。为工具书编制索引在国内外已形成共识,一套篇幅浩大的工具书若没有完备的检索工具,是无法使用的。

3.是提供事实或数据的索引

年鉴索引向用户直接提供所需的具体情报,包括某一事件的详情、某一图片、某一日期或某一数据的出处。综合性年鉴以提供事实为主,统计年鉴以提供数据见长。

(二)年鉴索引的类型

索引的类型十分复杂,从不同的角度可划分出不同类型的索引,如从索引的标目角度可分为著者索引、主题索引、题名索引等等;从索引编制方式角度可分为手工索引、机编索引;从索引的排序方式可分为字顺索引、音序索引、分类索引等等。中国年鉴索引中最常见的类型就是综合主题索引。一些综合性年鉴,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各省级、地级、县级年鉴,大都编制综合主题索引。

(三)年鉴索引的特点

年鉴综合主题索引的主题包含人物、事

件、机构等等,经分析、标引后不再分门别类,而按标目的某种顺序逐个排列。综合主题索引具有标引深度大、标引能力强的特点,可以进行多途径、多因素检索,还能通过参照系统揭示全书的内在联系。

二、年鉴索引的制作

(一)确定标引词

一个索引款目一般由标引词、附加词、页码、版面符号组成。因为年鉴的条目标题要求“望题知意”,体现主题,所以有的标题可直接作为标引词,如类目、分目标题,部分简洁明了的条目标题及人名、图表名等,而大部分条目要通过分析处理确定标引词。索引的排序与检索均以标引词为准,所以选准每一款目的标引词,对于保证索引质量、提高检索的准确率是至关重要的。

(二)制作索引款目

索引制作时要对目录中部分内容细化制作索引,如人名、统计表名以及其他一次性文献;除了直接作为主题词的类目、分目标题,部分简短的条目标题及人名、图表名等,要对大部分条目标题进行主题分析;从原句中分析出具有实际意义、最能体现本条目中心内容的关键性词语即主题词,然后使主题词前置作为标引词,以便于排序、检索使用。

(三)校对

校对一定要在排序之前进行,拼音的标注是否正确,页码、栏面的标注是否正确、是否变动,标引词是否妥当,索引的长度是否合适,这些都要在排序之前反复查校,排序后顺序重排与底稿不同,则不便校对。

●学术交流●

(四)排序与整理

年鉴索引排序方式一般采用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编排或按笔画编排的排序方式。利用计算机文字处理软件 Word 中的“表格”菜单,可以方便快捷地对制作好的索引款目进行自动排序。

排序前的技术处理。对编制好的索引款目中的标点符号、字母、“附见”等内容进行技术处理后即可进行排序。

排版整理。对自动排序后的索引草稿进行调整、修改;添加排序拼音标识;撰写索引使用说明;分栏排版;打印输出,存盘待用。

三、年鉴索引编制过程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年鉴索引的编制过程与其他图书的编制过程没有多大的区别,都要经历标引、生成款目、排序、印刷的过程。索引编制过程中,要注意标引范围、标引深度、规范取词等技术问题。

(一)标引范围问题

年鉴由于具有一事一条的特点,因此一般来说,一个年鉴条目提取一个主题做一条索引即可,对有些集合式条目、分目或类目,或隐含两项以上内容的条目,可从不同的角度确定主题,增补索引款目,用不同的标引词标引,以便读者从不同角度查找。

(二)标引深度问题

标引时要对包括条目在内的正文进行内容分析,分析出显性、隐性的主题,也要对辅助主题进行分析,从不同角度抽取索引内容,提供标引深度。加大索引深度就会增加索引

数量,为了便于查阅又要尽量做到少而精,所以选择索引款目与确定细分部类时要选择有索引价值的、信息含量高的资料。人物类一般索引到人名;统计资料一般索引到表格名称;对专文、特载、文献法规、附录等一般索引到文件、文章、事件名称,一般不再对这些部分的内容细化进行主题分析。

(三)规范取词问题

规范取词应做到:

1.标引词应是单主题词。主题词要涉及内容的主体,使人望题知意;词语要直指事物本身,而非有关的事、物或单位;一个主题词表达一个意思,力求语义的单一性,在使用多义词时,通过对词语外延的适当限制达到语义单一性效果,避免使用模糊词语,主题词多用名词、动词等实词或词组,一般不用虚词。如:“城中村改造与新农村建设”,应分列为“城中村改造”和“新农村建设”两个单主题词,编入索引。

2.一些口语化或叙述体的标引词不应出现在标目中。如:建成、开通等。

3.注意范围限定词的位置。如“第十届西部住博会”,应为“西部住博会(第十届)”。对于某些限定词的删减应注意仔细推敲,不能因强调简明而影响其专指的性能。

4.在上下文环境中没有实际意义的词应删去。如“对于”、“关于”等。

5.遵从读者的检索习惯,主题词的中心词要尽量前置或使用被动式,避免使用动宾词语,主题词不带报道性内容和具体资料。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马平甫先生 其人其事

◎ 封五昌

马平甫(1898—1960),西安市人,陕西省著名回族绅士。我记得他家世居北院门街南头,坐西朝东,房舍富丽堂皇,装修豪华,颇有官宦气魄。1920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大学法政专科学校。1926年至1935年,先后任国民军骑二师军法处长、驻陕总司令部参议。1934年,中国回教(解放前称伊斯兰教为回教)救国协会陕西分会成立,荣任首届理事长。1938年至1940年,受聘为委员长行营参事,却没有为行营办过一件事。抗战前后,与他人合资举办实业,为陕西出口和发展民族经济做出了一定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我六爷、戏剧家封至模先生因为给延安平剧(京剧)院置办戏箱,被旧西安警察局关押审讯,后经马平甫与张锋伯(解放后曾任西安市副市长等职)担保获释。

西安解放后,平甫先生热爱新中国、拥护共产党,协助党和政府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和重用。解放初被聘为西安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西安市民主

人士学习委员会主任、西安市中苏友协副会长。1954年任西安市第一届人代会代表,市政协常委。1956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同时兼任西安市人民政府委员,省、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多种职务。在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种社会职务中,不辜负党和政府及人民群众厚望,尽职尽责,参政议政,总是以党的政策和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仗义执言,为群众办了不少实事,诸如,正确贯彻执行民族政策,在镇反、戒毒、戏剧改革、民族教育、保护文物古迹等方面,均有建树。

1958年,平甫先生受到不公正待遇,被戴上“民族主义分子帽子”,受到批斗,庭院也惨遭破坏。他坦然处之,从不喊冤叫屈,坚信“冤案是人办下的,不是党的政策”,表现了一位爱国民主人士的刚正骨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为其平反昭雪,落实政策。

(作者为陕西省历史学会原副会长)



中国共产党
第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主席台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十届一中全会 1973 年 8 月 30 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 1249 人,代表全国 2800 万名党员。毛泽东主持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通过了上述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会议重点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 1975 年 1 月 8—10 日在北京举行。1975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决定将《宪法修改草案》及其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大讨论。全会选举邓小平

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 1977 年 7 月 16—21 日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还通过了关于提前召开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

中国历史上 两次国共合作暨启示

孙中山先生缔造的中国国民党，曾有过大革命和抗日战争这两页闪光的历史，值得思索的是这两页都和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的两次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进步，然而，两次合作都未能延续下来，从而造成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的不幸局面。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与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变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革命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但是到了大革

命后期，1927年7月，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右派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建立合作，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8月中旬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10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成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流砥柱，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空前壮大，成为决定中国政治前途的根本力量。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无论在酝酿时期还是在合作期间，苏美等国都曾起过积极作用，并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以后由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使国共关系



标志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

完全破裂。

两次国共合作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光明。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下列启示：

(一)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希望，为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而服务，代表着中国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和支柱。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中国各项事业前进的根本保证，党兴则国强。

(二)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勇于斗争的党，也是善于合作的党，统一战线不仅是我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创新的事业的永葆优势的武器。

(三)合作是有前提的，即有外在的相互需要性，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内在的智慧、胸怀、勇气和诚意。只要有共同的理想、追求、信念和

意志，就可以发生统一的行动擦出耀眼的火花。国共两党历史上的两次合作都是革命年代为对付共同的敌人而走到一起的，期望两党在今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年代，断然抛开历史恩怨、自身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为民族大义、为共同的建设而继续开展合作。因为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已是近现代中国国共关系史所明白证明了的。

(四)新的历史时期要进一步加强民族凝聚力。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求稳定、谋发展的今天，应继续高举民族团结、利益共同的大旗，避免对抗内耗，加强交流对话，追求互利共赢，通过国共再次合作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并由党派合作拓展到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人民的大凝聚大融合，由国内社会和谐拓展到国际正义的大联合，从而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新的更美好时代。



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延安大礼堂上悬挂的国共两党党旗。

孱弱晚清为何屡次援助他国

孱弱的晚清帝国，在风雨将来、财政入不敷出的窘境下，曾屡屡对他国灾害施以援手……

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清朝政府“颁帑十万助赈日本灾”。这样规模的经济援助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对日本的首次援助。清政府第二次援助日本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日本以水灾来告，输江、皖、浙、鄂诸省米粮六十万石济之”。晚清一直是把大米类同战略物资来对待，严禁输出，尤其是在本国饥荒灾难之年。1907年恰是中国的灾荒年，但清政府依然赈济日本60万石大米。

1908年12月28日，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市发生7.5级地震，丧生人数有15万之多。清政府没有袖手旁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出帑银五万两助赈”。此外，晚清政府对海外的华人也体现着祖国的“关心”。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美国旧金

山地区发生8.3级地震，清政府“颁帑十万赈华民”。

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广东周边地区发生飓风灾害，“发广东库储十万赈香港及潮、高、雷、钦、廉属风灾”。当时香港已是英国殖民地，但灾难当前，中国政府并没有置之不理。

其实，1905年至1908年的中国，饥荒、灾异几乎遍地皆有，多数省份都需赈济。并且，各地剿匪的大笔军饷开支也是清政府一项沉重负担。在这种窘况之下，清政府为何还积极地搞国际援助呢？这是因为，光绪末年的晚清在谋求国际社会的认同。晚清政府需要通过多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形象，以融入国际社会，从而学习国际经验，实现社会改良进步，巩固统治。然而，历史证明，晚清中国的国际形象，并不是仅靠对外的金钱捐助，就可以改变的。

(上接第25页)地望吻合。一为“下马陵”说。语出唐朝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旧说董仲舒墓，门人过皆下马，故谓之下马陵，后语讹为蝦蟆陵。”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外郭城·常乐坊》：“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俗误以为董仲舒墓，亦呼为蝦蟆陵。”此“误以为董仲舒墓”的蝦蟆陵，址在今西安东南郊沙坡村，现为西安交大校院内东南，距西安城较远。今西安城“下马陵”址说，缘起于明代。明正德元年

(1506)陕西巡抚王珣在西安城东南郊的蝦蟆陵处建董子祠。嘉靖二十一年(1542)，陕西巡按都御使赵廷锡将城外“蝦蟆陵”处的董子祠移建于西安城内今和平门内西侧路北，并在祠后起冢为坟，称作董仲舒墓。清康熙六年(1667)，咸宁知县黄家鼎在此重建祠堂三间，并在大门外立石，上书“下马陵”三字，门额砖刻“董子祠”三字，遂相沿于今。



女官俑

中国古代后宫的女官制度

女官的存续

女官的设置早见于先秦时代。文献记述，周天子曾立王后、夫人、嫔、世妇、御妻、女祝、女史等。其中，除王后、夫人与天子坐而论妇礼，是天子的正牌妻子之外，嫔、世妇、御妻等既是妾也是女官。嫔负责后宫女子的教育，世妇掌管后宫祭祀、宾客事宜，御妻照顾天子的衣食起居。掌管后宫祭祀、祷词的女祝和负责王后礼职的女史，则属于专职女官。

秦汉时期沿袭了前代的后宫体制，妃嫔的等级被进一步细化。秦始皇将后宫妻妾分为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 8 个等级；汉元帝更是将后宫妻妾列为

皇后、夫人、昭仪、婕妤、良使、夜者等 14 个等级。在秦汉两朝的后宫里，除了皇后、夫人之外，其他妃嫔仍然既是妾又是女官，她们有爵位也有秩禄。

首次将妃嫔与女官析分开来的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他专设女职以管理后宫事务，其秩与外官对等，出现了内司、作司、太监、女侍中、女尚书、女贤人、女书史等不同职衔的女官，高者二品，低者五品。隋朝，宫中建立了六局二十四司的女官体制，以掌宫掖（后宫）之政。六局分别有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工；六局之下每局下辖四司，司下又置若干职位，层级分明。根据不同等级授予不同官职，高者五品，低者九品。

隋朝的女官体制被此后的唐、宋、明三朝沿袭了下来，各朝只是稍有调整。如明朝初年，在前朝六局二十四司的基础上，又单独设立了宫正司，掌管纠察宫闱、戒令、谪罪之事；永乐之后，宦官得宠，女官的多数职权被宦官取代，六局被取消，仅存尚宫四司。清是少数民族政权，清朝帝王继承了前朝的后妃体制：“皇后居中宫，主内治；皇贵妃一位，贵妃二位，妃四位，嫔六位，分居东西十二宫，佐内治。”与此同时，取消了女官的职位，“贵人、常在、答应俱无定位，随居十二宫，勤修内职”。

女官的职责

女官们上承御旨、懿旨，下领百千宫女，各司其职，尽心尽力地打理着后宫的日常事务。以明初六局的职责范围为例，尚宫掌政令、文科、印玺、玩器；尚仪掌礼仪、音律、朝见；尚服掌服饰、化妆品；尚食掌食品、药品、

器皿；尚寝掌床褥、整理、用具；尚工掌营造、衣服、财务。

六局之下，各掌四司，工作细化。如尚食局，设尚食二人，正五品官职，负责膳馐、品齐之数，凡以饮食进御，尚食先尝之。下辖四司：司膳司负责割烹、煎和之事；司酝司负责酒酝、酏饮之事；司药司负责医方、药物之事；司饷司负责给宫人廩饩、薪炭之事。四司皆设女史多名，负责记录事宜。

生活于宫墙之内，服侍着帝王世家，女官们的工作又极为私密。女官中有彤史一职，“彤史者，后宫女官名也。其制，选良家女子之知书者充之，使之记宫闱起居及内庭燕褻之事，用示劝戒”。她们用一种赤色管的毛笔，专门记录皇帝、妃嫔的日常起居，甚至包括皇帝的性生活都得一一记录存档。

女官不同于下层宫女，她们是官，有官职，享俸禄。官位高者，如刘宋、北魏、唐朝时的女官，官位可至一品。这些女官在宫中受人敬重，在外朝也颇得朝官逢迎，有的女官因此得以干预朝政。职位低者，如隋朝、明朝的女官，官位高者仅为五品，有些甚至不入品秩。

女官又不同于嫔御，嫔御是帝王的妾，女官则是帝王的奴婢。历史上，确有女官因为得宠而成为了妃嫔，但对于大多数女官而言，这或许也只是她们一生的心理寄托罢了。稍有过错，女官还有被降为宫女的可能，甚至会遭到更严厉的惩罚，“凡宫人有罪者，发落责处墩琐，或罚提铃等名色以苦之”。

女官的数量，各朝也有出入。据史书记述：“唐设六局二十四司，官凡 190 人，女史 50 余人，皆选良家女充”；明初设六局一司，女官

总数约 300 人，因为人员众多、官职纷杂，还出现了“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频见错相呼”的现象。

女官的来源

历代女官的来源，主要集中于如下两个途径：

采选。采选宫女之事多见于史籍中：东汉光武帝刘秀每年都要“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隋“炀帝大业八年密诏江淮诸郡，阅视民间童女姿质端丽者，每岁贡之”；唐玄宗时“岁遣使采择天下姝好，内之后宫，号‘花鸟使’”等等。所选女子，貌美者为妃嫔，次美者为女官。采选也有只选成年女性的，如明“洪武十四年，敕谕苏松嘉湖及浙江、江西有司，民间女子十三岁以上、十九岁以下，妇人年三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无夫者，原入宫备使令，各给钞为道里费，送赴京师。盖女子以备后宫，而妇人则充六尚也”。

籍没。在中国古代，官员若犯了重罪，其财产、家眷可能要全部没收入官。以唐朝为例，“族诛者，既诛其壮丁，而妻妾子妇及子孙之幼者，皆没入掖廷为奴婢”。据《旧唐书》记载，唐咸通十三年，“国子司业韦殷裕于阁门进状，论淑妃弟郭敬述阴事。上怒甚，即日下京兆府决杀殷裕，籍没其家。殷裕妻崔氏，音声人郑羽客、王燕客，婢微娘、红子等九人配入掖庭”；再如文宗时，“御史中丞李孝本，皇族也，坐李训诛，有女没入掖廷”。



西安城门趣闻(六)——和平门

(西安城南面偏东门之一,位于和平路南口)

1.和平门位处唐崇仁坊南街口今和平门位置,在唐长安城崇仁坊南街南口旧址处。

崇仁坊为唐长安外郭城坊里之一。位于朱雀街之东第三街街东从北第四坊。万年县领。西界皇城,东邻胜业坊,北邻永兴坊,南邻平康坊。东西宽 955.5 米,南北长 808.5 米,平面形制为横长方形。坊墙四面中央各开一坊门,中有十字大街通四门。此坊北当皇城景风门,与尚书省选院相近,南临春明门金光门大街,东南与东市相接,选人京城无第宅者,多停憩于此。

其北街更是店铺毗邻,商贸之盛,倾于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坊中多达官贵人与公主第宅。唐末天祐元

年(公元 904)以皇城改筑为新城后,此坊被隔于新城之外,历五代宋金元时期。明初拓筑城墙始包入城内。1953 年新开此门,因在和平路南端而得名。

2.和平门内唐礼会院

今和平门西侧,曾是唐礼会院处。该院位于崇仁坊南门之西,为唐宗女出嫁礼会之处。开元十九年(公元 731)置。此地本为中宗女长宁公主宅,官市为礼会院。每公主或郡县主出嫁,皆在此院成礼,并由司农寺供给礼仪器物。安史之乱后,此院废而不修,后移于长兴坊。

3.和平门外唐太平公主宅

今和平门外昔为唐长安平康坊,坊中十

字街北东侧,有唐太平公主居宅。

太平公主为唐高宗与武则天之女,唐隆元年(公元710)参与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杀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扶立睿宗即位,因有功遂开府置官属,把持朝政,宰相多出其门。李隆基即帝位后,太平公主阴谋政变,谋泄逃亡南山,三日乃出,被执杀于其第。太平公主先嫁薛绍,后嫁武攸暨,长安居宅先后有三处:一在平康坊,一在兴道坊,一在醴泉坊东南隅。

4.和平门外唐李林甫宅

今和平门外昔唐长安平康坊南街,有唐奸相李林甫居宅。

李林甫(?-公元752),唐宗室。开元初,曾任太子中允、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因厚结玄宗宠妃武惠妃及宦官等,升任宰相。居相位十九年,妒贤嫉能,专政自恣,杜绝言路,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加陷害罪徒。对人表面可亲,而心存狠毒,有“口蜜腹剑”之称。居宅在今和平门外平康坊南街,宅第正堂之后,别建一堂,制度弯曲,有如偃月,故号“月堂”。李林甫每欲构陷大臣,即处月堂中,思其中伤陷害他人之计。若见他喜悦计成而出,则他家必遭破碎。

5.和平门南对唐“北里”

“北里”指今和平门外昔唐平康坊入北门东回的三条曲巷,因在平康坊北门里,故称“北里”。

北里为长安妓女聚居之地。其中等级较高的名妓,如杨妙儿、王团儿、郑举举、牙娘、颜令宾、王苏苏、俞洛真、王莲莲等,多住在南曲、中曲。其“卑屑妓”下等妓女,居住在循坊墙的北曲。时京都纨绔常来此狎游,及第进士也每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故当时称此处为

“风流藪泽”之地。郑合《及第后宿平康里》诗:“春来无处不闲行,楚润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头声”。楚润,即楚儿,名润娘,为当时北里名妓。唐人孙棨著有《北里志》,记宣宗大中年间长安平康坊北里妓院组织及妓女生活情况。另唐人也以里巷方位之别称北里。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南巷有贵人,高盖驷马车”;“北里有寒士,甕牖绳为枢”。

6.和平门外保唐寺

和平门外昔唐长安平康坊南门之东,有保唐寺。该寺建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初称菩提寺,唐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改名保唐寺。因寺东临宰相李林甫宅,故寺中钟楼不建在东侧而改建在西侧。寺中多名画家郑法士、吴道玄、杨廷光、董诤、耿昌言所绘宗教壁画。唐孙棨《北里志》载,每月逢三、八日,士子多来此寺,以每逢此日,北里三曲诸妓多来此寺听讲席,“盖有期于诸妓也”。旧址约在今雁塔路北段路东。

7.和平门内下马陵

今和平门内西侧顺城巷路北,有祭祀汉儒董仲舒的“董子祠”,祠后有冢称为董仲舒墓。相传昔日董仲舒门人过其墓皆要下马,以示尊崇,俗呼为“下马陵”,故和平门至文昌门段顺城巷,因有董仲舒墓而得名为下马陵巷。

汉儒董仲舒的葬地在何处,今有两说,一为陪葬于汉武帝茂陵。北宋《太平寰宇记》:“董仲舒墓在(兴平)县东北二十里”。今兴平县南位乡策村东南250米、茂陵东北652米有一墓冢。冢底部长71米,宽30米,冢高14.3米,当地人称为“次冢”,相传为董仲舒墓。此地与《太平寰宇记》所记(下转第21页)



西咸空港综合保税区保税事物服务办理中心效果图

西咸新区空港新城

空港新城是西咸新区五大组团之一,是陕西省政府批准设立的以发展临空经济为特色的开发新区,自组建以来,始终按照省委、省政府和西咸新区的总体部署,高标准编制发展规划,高起点策划引进项目,以建设一流的国际空港城市为发展目标,确立了“交通支撑、产业集聚、产城一体”的发展战略。

规划范围 141 平方公里。主体功能是建设西部地区空港交通枢纽和临空产业园。以临空产业为主,重点发展空港物流、飞机维修、国际商贸、现代服务业等产业。

空港新城成立三年来已经开工建设了综合保税区、西部飞机维修基地等 62 个重大项目,9 个项目已经封顶,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47 亿元,新城形象初步显现。在此进程中,空港新城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策划和引进了一大批文化产业项目。与陕西省书画家协会合作的西安国际美术博物馆、艺术家美术馆群、西安国际画家村,以及萧何曹参遗址园林、唐顺陵遗址园林等一大批项目正在建设。同时,还与陕西省作协和《美文》杂志社共同成立“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办了首届中国临空经济区发展与合作交流会、西安国际美术城系列论坛、中韩书画家笔会等一系列活动。目前,正在积极谋划完善文化保税、艺术品交易、国际会展等功能,并充分融合陕西历史文化资源、空港新城区域文化遗存和临空产业特色,对区内道路进行命名。

南张家庄村



城改前的南张家庄

位于长缨东路以南,万年路以西,长乐中路以北,勤工路以东。村周围市场林立,企事业单位环绕;南有全国闻名的西北轻工市场、人和市场、义乌商城、金海市场、城东客运站、万年饭店和陕西机械进出口公司等单位;东有胡家庙蔬菜、粮油、干菜、干果批发市场,西安光学仪器厂福利区,昆仑机械厂福利区;西临西京医院;北有西北航空办事处、福乐家具厂等。

据先辈传说,村中的张姓族人本不姓张,而是姓朱,乃为大明王朝朱元璋之后裔;在明朝衰落之际,清政府对明王朝后裔朱姓家族及官吏,一律格杀勿论。因而昔日当官为宦的朱姓族人,有的举家潜逃,有的易姓改名,以避灭门之灾。当时兵荒马乱,有一朱姓壮年,仓皇中携妻抱子向东逃亡,为躲避清军追杀,在逃到村南万子营时,适逢几个农夫在地里收割麦子和种地,忙乱中将自己的孩子交给这个农夫,恳求抚养,来日报厚恩,随之匆匆逃离。躲过了清军追捕,这个孩子以后长大,就跟随这个农夫姓张,以后便利用父母出逃

时所留的金银珠宝耕置田地,建造房屋。经几代人的繁衍生息,张姓家族不断壮大、分支,由起初的一户扩大到十几户,后来取名为张家庄村,因在村庄北边还有一村庄,故名南张家庄村。

另一种说法是:清军攻下长安后,对明朝官吏和朱姓达官贵人大开杀戒。一朱姓官宦人家,逃出长安城后,经万子营准备向东逃亡。当时的西安东城外地区,是一望无际的阡陌农田,村庄凋落,人烟稀少,荒草丛生,沟壑密布。这一朱姓人就在沟壑中躲过了清军。清军走后,他看到此处远眺终南,巍峨高峻,仿佛一道天然屏障;东边不远处,乃关中八景中的灞河、浐河,河水汹涌澎湃,常流不衰,河道翠柳如烟,田野庄稼茂盛;北边一望无际,全是平坦的农田,旁边的一条大道,就是关中通往关东的有名驰道。想到大明王朝奄奄一息,这里又是风水绝佳的好地方,他就易姓为张,在此建造房屋,购置土地。此说法很难找到可靠详实的根据,不过,据说在南京灵谷寺有一石碑,记载着南张家庄张姓由朱姓而来,可印

●我们的村落●

证张家先祖的传说。

追溯历史,在清朝时期,村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距长安城东有六七里之遥,村南有直通长安城的石子大路,这条大路居灞桥以东,乃由山西、河南到古长安的必经之路;故小商小贩,赶马车拉运的每天都要从这里经过,促进了当时的经济流通,活跃了市场,这条石子路也成为古长安丝绸之路一部分,往西可通往甘肃、青海及宁夏的主干线。村西与胡家庙村相邻,村北与北张家庄村土地接壤,村东与王家坟、十里铺等村邻近,南与韩森寨村为睦,方圆交通十分便利。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南张家庄村从解放初期的 60 多户、200 多人,发展到 230 多户、800 多人的大村(2006)。2012 年,村人口为 537 人。村姓氏组成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原南张家庄张姓氏族,当时有九户;二是四善堂四处义园的郝、陈、梁几大户,同时还有黄、周、王、熊几姓;三是胡家庙、王家坟、周家坡和东小寨迁来的吴、雷、于、赵等几户;四是宋家果园的宋姓(山东籍)。

南张家庄村自清朝初步形成,延续而存在下来;1950 年归灞桥区政府胡家庙管区管辖,1951 年改由红光管区管辖,1952 年划归灞桥区韩森寨联社;1953 年实行互助组土地经营,隶属胡家庙管区;1955 年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 年成立人民公社,属红兴公社管理;1960 年改由灞桥区兴庆公社管辖;1962 年西安成立大郊区,又划归大郊区兴庆公社管辖;1966 年南张家庄村归雁塔区燎原公社管辖;1972 年恢复南张家庄村大队;1976 年再归兴庆公社;1980 年改由西安市新城区农副局管理,同时南张大队也实行村建制,大队改为村

委会。2010 年 8 月,为配合城改工作,并按照撤村建居具体要求,南张村转为南张社区。

在讲述村名来历,曾提到过万子营这个地名。可以说,在南张家庄形成之后的发展岁月里,其间的环境与现在大不相同。这就不能不提南张附近的一条路,即万子营,其解放后改名叫苗圃路,现在叫金花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就是以这条道为基础修的驰道。当时的道路宽四米,是石子路,最早一直有专人养护;因此,自古以来,这条道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一直发挥着巨大的战略作用。慈禧太后西逃长安躲难,就是从这条道上穿过的。

万子营当时位置在今天的金花路邮电所大楼附近。虽说当年这里是西安通往东向一条交通要道,但是沟壑纵横,林木茂盛,沟里到处是难民挖的土窑洞。匪患滋生,袭扰乡里,南张家庄距之较近,对村民生活造成很大影响。

为什么叫万子营?当年河南军阀刘镇华为了自己的利益,率兵沿这条路围攻西安,久攻不下。看到这里林木参天,沟道密布,又有土窑,认为这里易守难攻,就命令部队在此驻扎,布置围城策略。由于兵力在万人左右,故叫万子营。南张家庄紧靠万子营,开始时受害不浅,后来情况趋于好转,万子营在西安渐渐有名起来。一直延续到解放后,这里重修了马路,万子营才被人们所淡忘。

由于历史原因及经济政策的限制,村民曾经长期只能靠种植农作物生活,过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一年所挣工分,多数人都不够扣除当年分配的粮食钱和平时的零星借款,亏欠队上的不少,生活困难。

改革开放后,得益于村周围市场的建立,一方面房屋出租成为村民的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大部分年轻人按照国家政策,以征地代劳形式到国营单位参加工作,就业和经济条件由此改观。

南张家庄过去村民的住房,除原来张家几户有钱人的四合院比较好外,大部分村民都是老式砖加土坯旧瓦房。20世纪80年代以后,村合理规划,科学布局,村民把自己原来的土木结构瓦房翻新成楼板房,由简易结构变为新式砖混结构的五层楼房,几乎每家每户都有6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随着房屋

的更新和扩建,旧的村貌及迹象已不复存在,加之在市场和单位的包围之中,南张成了典型的城中村。

2003年,城中村改造计划启动,南张家庄从大局出发,找到了突破口,并制定了初步方案和实施细节,即以建设万年路大型综合楼为开端,拉开村城改序幕。到2006年底,综合楼主体工程竣工,这一有着两万多平方米住房和商业面积的大楼已投入运营。按照城中村改造整体规划,南张村的拆迁已提上议事日程,南张人正在展望和谋划未来。

(选自《西安村落记忆》资料)



城改后的北张家庄村

北张家庄村

位于西安市东郊,南邻长缨东路,西接东车站路。

古时出西安东门五里至张家庄,以马道沟(即今长缨路)为界,沟南称南张家庄,沟北为北张家庄,南、北两庄虽同姓,但不同宗。

据考证,北张家庄村历史可以追溯至明朝后期,距今已五百多年。明朝时一位陕西巡抚张自明的后裔,见此地民风淳朴,土地肥沃,遂落根于此地,以务农为主,兼事工、商,

繁衍生息,长久居住下来,故得村名。村中祖坟设在陆家寨北陵之上,占地二十余顷,有很多石碑、石人、石马散落其间。

解放前,村民以务农为本,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为生的乡村;当时村中有五家纸坊,两家烧坊,三家人在农闲时用自家马车在外搞运输。大多数村民只能靠给人打零工勉强度日。

解放后,村中成立了村委会,隶属于西安市第十区鞞耳朵乡,村委会组织发动群众斗

●我们的村落●

地主、分田地，当时村中有田地四百余顷。1951、1952年，关中风调雨顺，庄稼收成好，家里有了余粮，村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1953年，村里根据政府要求成立了互助组。同时随着国家工业强国路线的开始，村子附近成立了西光厂，按照63元每顷的价格征用了村中大片土地。1954年，村中建立初级合作社，隶属于灞桥区红光公社。1955、1956年时，西安电机厂、石棉厂、药材公司、化工厂等先后建成，征用了村中70%的土地。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1959年、1960年，大跃进活动开展，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开始实行供给制，村民的生活又变得异常艰难。北张村的命运在以后的年代内都随着各种运动的起伏，而留下时代烙印，如1965年的社教运动，1967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等。1972年，电机厂又占用了村中的一部分土地，村里也办起了翻砂厂。1979年，航天06所征用了村子原先的地方，村子整体东迁至现今的位置。1989年，大庆油田办事处又征用了村中的一些土地，至此，村中土地所剩无几，村属企业也只有北张温泉仅存。此时，村子开始统一建房，按照年龄进行分配。村民没有了土地，只能靠租房收入来维持生计。

随着村级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北张家庄先后称作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队、革命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现归属新城区农村工作局领导。为配合城改工作，以及撤村建居的总体要求，2010年元月，北张村经上级批准转为北张社区。

解放初期，村中仅有23户村民，80余人；随着社会的稳定，村里人口不断攀升，20世纪70年代，村里有600余人；20世纪80年代，经

招工、招干，加上征地代劳，转出村民400余人，此时实际村民数为200余人；2006年，由于城中村改造，村中剩余农业户口全部实现了“农转非”，村内常住人口接近300人。2012年三季度统计数显示，北张村人口为281人。

解放前村中小孩很少上学，大部分只能在家里帮忙干活，维持生计。解放后，经过不懈努力，村里设立了育红班，重点教育学龄前儿童；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现在村里孩子基本就读于张家庄小学和西安市72中学。

全村现有人口中，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的约占30%，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约占60%，大学或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约占10%，全村已基本无文盲。

20世纪50年代，房屋基本为“砖垫脚、胡基础、单面夏子小瓦房”。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村里统一盖三层楼房进行分配，给村里姑娘们也盖了单元楼。

抗战时期，村中开纸坊和烧坊的张老三长子张自强，于1935年上初三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前夕，接组织通知，紧急撤离，到达渭河北时，由于封锁严密，暂时加入杨虎城的部队当兵。半年后，找到机会，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延安。在延安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被派到山西开展工作，半年后到山东巨野任县委书记，发动群众，坚持敌后抗战工作。其间，曾多次受伤，最严重的一次枪伤危及生命，幸被一村姑所救。名叫秀梅的村姑，受尽严刑拷打，坚强不屈，保全了张自强。在她家养伤半年，两人日久生情，后结为伉俪，一时传为佳话。解放初，张自强任锦州航校书记，后受庐山会议影响，脱下军装，转业后任成都

铁路局书记。2003年因病去世,享年83岁。

历史上北张家庄村民就有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人们和睦相处,宽厚待人,济困帮贫,是温馨的大家族。随着时代的发展,北张人不但生活水平得到改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亦不同以往;旧的观念、旧的风俗荡然无存,封建迷信、糟粕理念扫地出门。多年来注重村民的道德规范教育,加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建设,不断整治村容村貌,既美化了周边

环境,又净化了村民心灵。村民的道德观念在加深,大局意识在增强,积极配合城改就是很好的例证。

2009年,北张村响应政府城中村改造号召,整村拆迁,逐步完成撤村建居。在村子原宅基地上,启动的唐韵三坊项目工程已建成高层楼盘;2011年9月,村民陆续回迁,大多被安置在唐韵三坊住宅小区1号楼。

(选自《西安村落记忆》资料)



城改前的三府湾村

三府湾村

位于西安火车站东约一华里、明城墙东北角下约半华里处,东边是长缨锦绣鞋城和轻纺市场,南临闻名全国的康复路集贸批发市场,北靠陇海铁路。另有宽阔的西临高速公路横贯东西,长缨路自村口穿过,交通便利。

在唐朝,三府湾村是三户府台大人的花园,这三位大人的花园都由一位叫王凹的人进行管理和经营,所以就叫三府凹村,历史上就以务花盛产花木出名。沿袭至解放后,因把凹字念转了音变为湾字,就叫三府湾村。

王凹本人不知何故惹怒朝廷,满门问斩,尸体就埋葬于紧挨村东南角的坟滩内,直至

解放后村民还称其为王家坟滩。后被西安市筑路机械厂征用,按无主坟予以处置。

曾经的三府凹村,离城最多不过一华里。由村北巷、西口出村向南方向出走,不到半里路程分叉,一路直向西南约半里路程,从现在的中山门进城;另一分叉路一直往西约半公里路程,进过去的“中正门”,即现在的解放门入城。也可由北巷、南巷两巷东口出村直向南,也约一华里路程,进入八仙庵梢门入东关,直向现在的长乐门入城。当时道路均为土路,坑凹不平,如遇雨天更是泥泞不堪,实难行走。

刚解放时,该村属于十区尹家街乡,实行

●我们的村落●

农会制。到 1956 年,又划归长乐区韩森寨乡。公社化时期,划归灞桥区红光公社。1962 年至 1964 年,划归新城区管辖。到 1965 年以后,又划归灞桥区。其中雁塔区也曾管辖过几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村民委员会制。1983 年划归新城区管辖后,再无变动。2011 年 4 月,三府湾村响应政府撤村建居的号召,转为三府湾社区。

据老辈人讲:“村大约在二百多年前,只有三户人家,一家姓朱、一家姓王、一家姓傅,除了这三户人家系老户外,现全村所有其他姓氏均系从外地因各种原因迁入。盖因村地理位置离城关较近,生计好混,故附近村子的农民和外省外县人,利用各种关系逐步盘踞此地混生活,至解放前已有 60 多户人家,自此村子形成一定规模。解放初期统计资料显示,村里当时有农业人口 72 户, 421 人。2006 年,全村有 350 户, 900 人,居住较为分散,基本分布华清路沿线和老宅地区。由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西安农业机械厂建设用地,部分村民移迁灞桥区蔚家坡居住。随着国家建设土地逐年减少,村民生计来源主要依靠于出租房屋,有部分村民搞个体经营。2012 年三季度统计显示,全村为 955 人。

在旧社会,该村文化教育水平相当低,除少数几个人上过私塾外,只有二人上过正式学校。解放后,村上集资加上政府支持,一方面改造庙宇,腾出大殿三间做教室;另一方面,自盖三间教室,满足村民子女入学。1955 年,因开辟华清路,由政府把村教室拆迁搬至张家庄小学,从此由政府安排学生上学。据统计,从 2002 年至 2010 年,共有上大学者近百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相当普遍。

因村在唐朝时就是三家府台的花园基地,故世代沿袭,均以务花木为生。村中所有土地,由解放前的 1200 余亩,到解放后建社期间的 700 余亩,大约一半以上都种植花木。解放后为了搞好绿化环境工作,曾任陕西省长的李尔重和西安市市长张铁民曾来村鼓励村民搞好花木生产,为绿化、美化环境做贡献。“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花木绿化成为封、资、修,数百亩花木被砍伐铲掉毁灭后晒干烧了砖瓦窑。自此,村花木绝种,花匠乏人,一个不但供应西安市而且历朝多代供应全国各地有名的“花村三府凹”遁迹。后虽然努力重振花木种植,但由于品种与人才所限,旧貌难现。

村上风土人情质朴,民风淳厚,从历史上就有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尊老爱幼、爱护妇幼的优良传统,况且凡过去的外来户,基本上都有历史的亲属关系,自然形成了一家有事大家帮,一人有难大家助的良好习气。

在旧社会直至解放前,村民居住较为集中,总共只有三个点,有三名称代替,一叫北巷、二叫南巷、三叫庙门儿。这三个点的排污雨水均有去路。如北巷人在居住的庄基地北墙后留有约五亩地多的涝池,如遇淋雨及暴雨均可顺自然车辙流入涝池,逐步渗完,多年来没有出现水灾隐患。村民解放前基本沿袭着旧社会的建筑格局,大都未用砖做鞞脚,都是下半部用土打,上边胡基墙,单面厦子小瓦房。每间小瓦房最多不超过 10 余平方米,平均都是 3—5 人住一间,全村 60 多户只有两家盖的是鞞间房。

解放后尤其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村民经济条件改善,大都住上了砖混结构楼房。村集体也于 1982 年建起了一栋五层高的商

业楼,命名为三府湾旅社,后又陆续建成了三府湾停车场(现已被华清路拓宽征用)、三府湾旧货市场等。21世纪初,响应政府号召,开展城中村改造,实现“四个转变”,即:农民变居民,农村变社区,集体经济变股份经济,集体土地变国有土地。从2006年7月31日零时起,与所有新城区域城中村村民一起身份变为城市居民,为彻底结束农、居混合管理提供了新的模式。如果各方协调到位,2012年,三府湾村城中村改造的正式启动年,下半年有望进入宣传动员、拆迁阶段。

村土地大多在村北,1932年因开通陇海铁路,将种植土地和村庄隔断。有三处古迹曾遗留,现已难寻踪迹,村人徒留记忆。

一是在村北号称北岭原上,有连接在一起的两个大冢,方向系南北直线,两个大冢中间系由用土夯实约两米高30余米宽的土台链接在一起,村东北方向、村东南角各有一个土冢,四个土冢的大小都差不多。冢的构造面向西安城呈弧形,包围着村,因四个大冢常年无人护理,长满野草,冢周也未发现碑记记载。除东南角的一个墓冢于1940年左右被盗墓贼从一民用井中开洞盗窃过外,其他的完整遗存。按我国常情唐塔、汉冢、晋文章的流传可能属汉代遗迹。解放后,因国家基础建设需要,被省木材厂和西安筑路机械厂等单位推平。

二是村北边沿线上,于120年多前建有一座古庙,面积约90平方米,从中自然分为三间,西边一间放有送子娘娘,中间一间敬的是关公大帝,最东一间敬的是马王和牛王。“文化大革命”时被搬掉投入井中,后因扩路,庙址也已拆除。

三是村向北约一华里地带,有一巨大墓

园,门前有一东西土路直通现在的自强路,墓园面积约有五亩,前门系五风楼模式构造。有座高大的墓碑,高约5米,宽1米多,大门的宽度约有5米,进门后下台阶建有1米5宽的砖铺小道,向南约200米便到墓葬祭台前边,植苍松翠柏,祭台两边也有两座高大碑记牌楼,墓冢上边完全栽植迎春花。在墓园东边隔离有一约一亩地大小的院子,盖有土木结构的四间瓦房,供看护墓园的人员居住,并在墓园南墙外向南辟有20多亩地,供看墓人员种地为生。墓前四个大牌楼的题字人是原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墓主名叫彭仲翔(1881-1924),即彭世安,辛亥革命中和于右任是同事,是同盟会元老(后全家加入共产党在陕北工作)。1924年被刘镇华镇嵩军杀害;几经交涉,才将一无头的尸体搬回西安,按形象配置了一颗全头,隆重纪念埋葬于此,于右任为其撰写墓志铭。墓园在村方圆十里之内,也是十分少有的景象,使人感觉庄严肃穆。1925年于右任书丹、沈尹默撰文的彭仲翔将军碑文。从此,每年清明,其夫人王竞秋(解放后为西安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率领其亲属(大女儿叫彭毓泰,解放后曾经任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前来扫墓祭奠;特别是1946年清明节,于右任老先生亲临主祭;祭祀后恭请于老先生为村小学写了两幅牌匾,一个是长方形校牌,上书“西安市第十区三府凹北岭小学”,另一块是方匾,上书“礼义廉耻”四个方形大字,制作好后常挂于村小学大门内外,以示观瞻。遗憾的是,1953年因国家征用土地,将墓园拆除迁走(西安三兆公墓),于右任所书之牌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销毁。

(选自《西安村落记忆》资料)



户县北乡锣鼓

富小云整理

户县北乡锣鼓，是指户县北部乡村的传统锣鼓。主要分布在渭河南岸、嵎坞岭上下。集中在三个城隍社的村子，祭祀着三个城隍神。渭河南岸一带 19 个村为一社，奉纪信为城隍，称为大城隍。往南，大官路东西 21 个村为一社，奉韩成为城隍神，称二城隍。县城附近，涝河东西 13 个村子为一社，奉周苛为城隍神，称三城隍。北乡锣鼓起源于唐代宫廷音乐，传承于宋元，自明代以来，特别是在迎祭城隍的活动中，北乡锣鼓得以充分的展现和发展，形成其特有的艺术风格。鼓调主要有《凤凰三点头》《十样景》《一串铃》以及《走鼓》等。《凤凰三点头》音乐结构严谨，节奏明快，前后贯通，环环紧扣，其表演铿锵有力，轻重有致，大气从容，豪壮动听；《十样景》音乐结构复杂，配器丰富而讲究，传统上曾有管弦丝竹等文乐，其演奏手段非常细腻。北乡锣鼓的乐器由鼓、铙、号、铜锣、夹子、梆子、堂鼓等组成，锣鼓表演时少则百人，多则数百人，且有旌旗仪仗前导，规模宏大，威风整齐，雍容华贵。户县北乡锣鼓自民国以来就常被邀请到西安和各县城表演，近些年来经常参加西安

的重大庆典和全国性的大赛。留南村锣鼓队曾获得中华鼓王称号。2009 年，户县荣获中国鼓舞之乡称号。

户县北乡锣鼓历史悠久，它包含了唐代宫廷音乐、民间文化、民俗和民间艺术等多种元素，保存了丰富的历史信息。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北乡锣鼓在音乐结构和表演上更加丰富，更趋完美，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北乡锣鼓的基本特征：

1. 与民间的祈年、社祭以及迎神报赛等古老习俗相伴生，至今依然在这些民俗活动中得以传承发展和展示，因而具有对民间习俗的依存性特征。

2. 在表演上质朴自然，率性自在，大气从容。同时其表演在细节上又丰富多彩，极其讲究，是粗犷与细腻的高度统一，野性与高雅的完美结合。

3. 北乡锣鼓经过民间千百年来锤炼和积淀，其音乐结构严谨精炼，配器科学，表演精到，堪称经典。中国打击乐学会会长安志顺认为，留南村的“凤凰三点头”鼓调，加一句则多，减一句则少，环环紧扣，前呼后应，结构非

常完美。“十样景”鼓调把锣鼓的音乐表现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十环鼓调表现十个情景,风格上又能做到高度统一,让人叹为观止。它对鼓边和鼓槌的充分利用,极大地增强了鼓这一乐器的表现力。也形成了其显著的表演特征。

4.北乡锣鼓鼓社众多,在长期的表演和相互交流中,形成了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特征。

北乡锣鼓习俗:1.锣鼓祈年和迎神习俗。北乡锣鼓与古代的祈年、社祭、逐疫、庆丰收以及迎神报赛等古老习俗相伴生,历经千年,传承至今,依然在北乡群众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带村村都有世代传承的锣鼓社,这些锣鼓社规模大者有上百面锣鼓,小者也有数十面锣鼓;锣鼓社都有主事的鼓头,锣鼓头一般由有威望,并且精通锣鼓艺术的长者担任,遇到有活动,锣鼓头都能迅速组织起锣鼓队伍。北乡锣鼓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迎祭城隍。北乡的50多个自然村在历史上形成了三个城隍社,在这三个城隍社中,每年都要定期迎送,轮流祭祀城隍。在迎送城隍活动中,送神和迎神的村子都要组织规模宏大的锣鼓队伍。同时,城隍到达村子后,该城隍社的所有村子都要组织锣鼓队前去送钱粮。可以说,每年一度的迎祭城隍活动就是北乡锣鼓的盛典,其规模之宏大,表演之庄严,村民参与之广泛,在整个关中地区较为少见。

2.赛鼓习俗。北乡的很多村子在春节期间都有赛鼓的传统。赛鼓活动一般先由一方到对方村子打鼓挑战,对方回应后到约定的地点进行比赛,或以固定的路线进行巡游表演比赛。赛鼓活动少则进行三天,遇到双方阵势和水

平不相上下,群众热情高涨时,往往打鼓六七天仍不罢休。

3.日益泛化的锣鼓习俗。在长期的锣鼓传统中,北乡锣鼓逐渐演变为乡村最为重要的集体表达方式,成为群体意志的集中体现。民国时期,尤其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乡锣鼓在沿袭祈年、庆丰收和迎神报赛等古老习俗的同时,活动日益频繁,被更加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如:北乡锣鼓曾参加陕西群英会开幕式、宝鸡峡水库竣工典礼、三原城隍庙会、户县农业学大寨开幕式、陕西航空预备役大会开幕式、中国民间绘画艺术节、陕西第十三届和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式、草堂寺佛像坐落草堂寺大典、曲江之春大唐芙蓉园开幕式、全国农民运动会开幕式、西安鼓楼巨鼓悬挂典礼、陕西第三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等重大活动的表演。

北乡锣鼓的鼓调和表演风格:主要鼓调有《凤凰三点头》《十样景》《一串铃》《走鼓调》等。

1.凤凰三点头鼓调:共分四个段落,第一段为“丹凤朝阳”,第二段为“双凤展翅”,第三段为“群凤和鸣”,第四段为“凤凰三点头”。全曲结构严谨,环环紧扣,前后呼应。整个鼓调节奏明快,轻重有致,在大气沉稳中,细节变化非常丰富。凤凰三点头的表演队伍以鼓和铙为主体,头尾各置一面大堂鼓分别领军和殿后,同时配大锣四面、小锣两面,马号两把、梆子两到四副、夹板四到八副。各种乐器演奏和谐,形成自然的配器效果,产生出强烈的音色对比和强弱对比。

2.十样景:鼓调节奏明快而富于变化,音乐结构严谨而宏大。其鼓调共分为十环,依次为:凤凰单展翅、鹦哥上架、狮子滚绣球、黑狗跳墙、黑驴滚蛇、二龙戏珠、喜鹊啄食、孔雀开屏、龙虎斗、大圣翻跟头。这些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名称或拟声,或摹形,或表意,生动地概括了这一鼓调丰富多彩的音乐特性和表演特征。其现今主要配器有鼓、铙、锣、号、梆子、夹板等。锣鼓队组成一般是一面鼓配两副铙,其规模根据村子大小决定,最少都在二十面鼓,四十副铙。锣一般是四面,马号两个或四个,梆子四副,夹板四副。据当地老人讲,过去在鼓队中有笙、箫、笛子、胡琴等文乐器。十样景为场地表演锣鼓,鼓皆置于鼓架。鼓手和其他演奏人员基本都是原地不动进行表演,可称为纯音乐锣鼓。十样景在鼓的敲击上,极富变

化,非常复杂。它在鼓面敲击中,加入丰富多彩的鼓槌碰击和鼓边敲打,时而鼓槌打鼓边,时而鼓槌互相撞击,时而在手上来回颠倒,时而抛空,花样层出不穷。在繁复交错的鼓面鼓边敲击和鼓槌碰击中,形成了极其丰富的音色变化和节奏变化。在十环鼓调中,环环不同,环环都有新花样。而铙、锣、号、梆子等乐器与鼓的配合天衣无缝,水乳交融。形成了音色丰富,节奏明快,细腻文雅的音乐风格。

2011年6月,户县北乡锣鼓入选陕西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解字·

“争”



这是“百花争春斗艳”的“争”字。甲骨文①是上一只手和下一只手在争夺一个曲形的东西,两手相争互不相让。金文②也同样是上一只手和下一只手在争夺一件像耕田的犁耜一样的东西。小篆③也是两只手在争夺一条像弯曲的木棍一样的东西。尽管这三种形体所争的东西不一样,但都有两只手在争夺的意思,前后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把这个字的本义理解为“相争”,那是没有疑问的。④是楷书的形体,相争之物变成了一竖钩。⑤是楷书的异体字,因形体的笔画少,书写方便,所以现在废除了“𠂔”字,而保留了“争”字。

“争夺”是“争”字的本义,如《韩非·说林下》:“争肥饶之地。”就是争夺肥沃的土地的意思。从“争夺”引申为“争辩”,如《战国策·赵策三》:“鄂侯争之急,辨之疾。”

“争”字在西北方言中还当“差”讲,如:“比着桃源溪上路,风景好,不争多。”辛弃疾《江神子·博山道中书王氏壁》这个“不争多”就是“差不了多少”的意思。现在西北人说:“争点儿摔倒。”也就是说差一点儿摔倒。“争”字还能当疑问副词“怎”讲,如李商隐有这样一句诗:“争拭酬恩泪得干。”这个“争拭”就是“怎擦”的意思。现在所说的“争知”也就是“怎么知道”的意思。

另外,当“争”字读 zheng(正)时,就当“规劝”讲,这个意义后来写为“诤”了。这就产生了一个左形右声的新形声字。

中国古代帝王大都有写诗癖

上古的一些帝王,从传说中的黄帝、尧、舜到周文王、周武王,除掉帝王的甲冑,都有一套诗人的衣裳。像舜帝就曾和群臣集体创作了《卿云歌》,这首诗十分有名,北洋军阀时期曾以此诗谱曲作为民国的国歌。歌中有“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之句,复旦大学从中取了两字作为校名,足见其影响力之深远。

楚霸王项羽和汉高祖刘邦,大概算是帝王诗的开山鼻祖了。这俩人不仅争天下,也争诗人的桂冠。项羽兵败,作《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雅不逝。雅不逝兮无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数年后,刘邦也写了首《大风歌》,与项羽“PK”：“大风起兮羽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两首诗各有千秋,这两位战场上见了胜负,诗歌上依然难解难分。

秦皇汉武,秦始皇没留下啥诗歌,大概是不屑为之,汉武帝却是位不折不扣的诗人。他写过《秋风辞》《天马歌》《瓠子歌》等诗赋,明代王世贞认为其成就在“长卿下,子云上”,把老刘抬到跟司马相如和扬雄不相上下的地位。

代汉的曹魏虽是小王朝,但诗翁辈出。魏武帝曹操堪称帝王诗的翘楚,他写的《观沧海》《龟虽寿》《短歌行》等诗乃诗歌王冠的瑰丽珍珠。在老曹的影响下,曹丕、曹植、曹叡都

诗作颇丰。尤其是陈王曹植是“专业诗人”,其代表作《七步诗》以豆萁与豆做喻,唱出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绝唱,无怪乎其人被后人赞叹“才高八斗”啦。

南朝帝王的诗歌素养普遍很高,像宋文帝刘义隆、梁武帝萧衍父子、陈后主陈叔宝写诗都相当不错,但他们的诗多儿女情长,风云气少。这种诗病一直“遗传”到唐朝,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三位皇帝奠定盛唐,其诗水平一般,放在唐诗里根本就不显山露水。

唐宗宋祖并称,宋太祖赵匡胤只能算半个诗人,他只写过一首半诗,果然是“稍逊风骚”。老赵的手下败将南唐李后主李煜在文学上远胜老赵,他后期的《虞美人》《浪淘沙令》凄凉悲壮,意境深远。王国维赞誉李词“神秀”,纳兰性德更将李词置于宋词之上。

明太祖朱元璋是个粗人,有时也附庸风雅。他的诗艺术性稍差,但胜在霸道,尽显帝王气象。如他有首模仿黄巢的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唐以后,有许多异族皇帝热衷写诗。清乾隆帝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数量多,却无甚可观,反而不如辽道宗耶律洪基和金海陵王完颜亮等人的诗有亮点。



宋代冗官为何多？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官员的录用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商周时期是世卿世禄制，汉代以后实行察举征辟制，无论是世卿世禄制也好，察举征辟制也好，都摆脱不掉世袭的臼窠；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实行九品中正制，而九品中正制的初衷也是出于遴选德才兼备的人才，实行贤人政治的考虑。但实行的结果，却是选官仍为世家大族所把持，家世门第成为选贤举能的标准，从而形成了门阀政治。隋唐开创了科举制，以考试、竞争的方式选拔人才，这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大创举。但在隋唐时期士族仍有相当大的影响，科举选仕只能是过往官员录用的一种补充，尽管五代时仍举行科举考试，但规模和影响都已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了。经过唐末农民大起义及五代十国的内乱，到了宋朝建立时期，士族势力已被扫除殆尽。宋朝于公元 960 年正月间正式建立，次月就举行了科举考试，足见当时的统治者求贤若渴。

荫补或称荫恩是官员所享有的一种特权，其子弟亲属凭此可以自然地进入官僚队伍。荫恩与科举一样都是宋代士人进入仕途的一种途径，只是荫补只限于官员的子弟亲属，所依凭的也只是与官员的亲缘关系。实际

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荫补也是一种世卿世禄制，只不过选官的权力由大臣交还给了皇帝。你能当官，完全是皇帝的恩典。如果说科举制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具有相当的历史进步性，荫补则体现了“亲上加亲”的特权思想，是血缘、裙带关系在政治领域中的体现。荫补尽管无法保障所产生的官吏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但它是统治者显示恩典、笼络官员的重要手段。宋代许多官员享有恩补子弟与亲属为官的特权，荫补名目之多，也是中国历史任何朝代都无法匹敌的。这实际上也是造成宋代冗官众多的原因之一。

在宋代做官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因为官员获得恩赏的机会很多，来钱也很容易。立功、生病、致仕、病故等，都有可能获得朝廷的赏赐，甚至无功无绩者，只要是没有什么大错，也会有受赏的，这没什么道理，全凭皇上兴致。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宋代经济是多么的发达，皇帝手里可用的零花钱比较多，所以经济利益也是士人进入仕途的基本原因和动力之一。

宋朝草创之初，官员和机构都很少，内外官员约五千人；到了景德年间（1004—1007

年),已达一万多人;而皇佑(1045—1054年)年间,更增加到两万多人。事情还是那么多事,办事的人却增加了许多,这势必造成人浮于事,推诿扯皮。因此宋代最重要的特色是,每遇大事人人都发表意见,但人人都不想承担责任,议而不决成为常态。

在宋代新旧党争中,台谏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谓台谏是指御史台和谏院,它们本来是不同的两套机构,前者负责监察百官,后者负责劝谏皇上。但是在宋朝,原本互不搭界的两件事权却不知何时相搀相混了,御史台和谏院不再有明确分工,形成了所谓的“台谏合一”。在这种情况下,谏官的工作也由监督规劝君主转向监察百官,等于原来由御史台管的事,谏官也插进一杠子。这么多人的眼睛紧盯着官员,这让官员如何正常工作?再加上台谏官改由皇帝亲自除授,所以台谏系统脱离了宰相的控制,成为专门制约、对抗宰相和百官的力量。原来皇帝每做一件事,多少还要考虑大臣特别是台谏官的意见,如此这些制约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北宋的后期,皇帝一味的胡来,将好好的江山折腾得国破家亡,台谏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

特别是台谏一直以来有着“风闻奏事”的特权,即“不问其言从来,又不责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治罪”。一般人若是听着风就是雨,任着性子胡说八道的话,是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的。而台谏官则不需要有真凭实据,也不需要对所说的话进行调查核实,就可进行弹劾,而且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事实证明,风闻奏事让台谏更多地起了搬弄是非、制

造事端,扩大矛盾的消极作用。

王安石在其为官过程中,与许多士大夫都有过交游,如吕公著、韩维、欧阳修、司马光等都是文坛、政坛的名流。他们对王安石的成名升迁都曾有过帮助,彼此之间原本有比较好的私交。但在关于变法的政争中,许多过去的师友都站在了对立面,面对来自亲朋故旧的反对,王安石并未动摇。史书称他对反对变法的亲朋故旧“悉排斥不遗力”,“罢黜中外老成几尽”。晚年的王安石变得心平气和,少了许多“执拗”,他承认当年确实与众多朋友交恶,但都是因为对国家大事的不同见解而致,并不涉及个人恩怨。

与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相反,在北宋党争中,也有这样一种人,他们没有一定的政治信念和主张,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善于窥测政治风向,为达目的常不择手段。这样的小人以邓绾和蔡京为代表。

在熙宁年间,王安石秉政之时,邓绾上书支持变法,“敲竹杠上附政嵩十事,以为宋兴百年,习安玩治,当事更化。”邓绾不遗余力地吹捧王安石和他的新法,“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圣泽;以臣所见宁州观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知,知天下皆然。诚不世之良法,愿勿移于深议,而坚行之。”邓绾的一席话,让王安石很受听,因此邓绾自然受到皇帝和王安石的关注。当邓绾处心积虑地跑官要官时,受到许多人的嘲笑,他并不以此为意,说:“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但是当王安石罢相后,邓绾迫不及待地与王安石划清界限,立即依附于吕惠卿、章淳,并以攻击新法来掩饰自己的行为。

中国的皇帝为何喜欢查户口

刘邦：得户籍者得天下

《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当初秦末天下纷乱，项羽与众英雄盟约，谁先入咸阳即为天下共主，阴错阳差，起于泼皮无赖的刘邦得了先。刘邦军队进入咸阳，诸将都忙着冲进后宫或达官贵人府邸抢夺金银财宝和美女，只有萧何一头扎进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以及皇家图书馆，将“律令图书”转移到安全地带派人严加看守。

太史公司马迁记载这件事后写下这样的话：“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意思是，刘邦日后能够迅速由弱转强，最终消灭包括项羽在内的各路诸侯，关键是了解当时中国的地理民情，而这些都来自萧何当初在咸阳的“收藏”。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隋文帝：有图有真相，严查偷税漏税

隋朝承袭北朝的经济制度，以人头与土地相结合，赋税的征收和徭役兵役的发动都是以户为单位，以人头为核算起点。要知道确切的赋税额，其前提，必须有个确切的户口数，也就是确切的户籍数。可是，从南北朝以来，政府所掌握的户籍数，与实际户口情况极

为不符，隐漏非常厉害。造成隐漏的原因，大致是：有些家庭的户籍，仅报丈夫，不报妻子；有些家庭虚报年龄，或老或小，避开丁男（国家年龄达到法定赋税徭役起征标准）年龄段；有些游手好闲者，荡逃在外。所有的表现，症结只有一个，即逃避赋税力役。

为解决户口隐漏问题，隋文帝在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推出了检括户口的运动，即“大索貌阅”。运动首先在山东进行，继而，推广到其他各地。

隋文帝大索貌阅的工作，做得相当细致、相当到位，可以说是卓有成效。最终，政府公布的成绩是：增加丁男四十四万三千，增加人口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业五年（公元 609 年），文帝的接班人隋炀帝在大臣裴蕴的建议下，再度大索貌阅，并立法规：凡是某地户口有一人不实，当地长官削职；若某人检举出某家隐匿一个丁男，可以此被纠之家代替输缴赋役。此法规颁布后，共计增加丁男二十万三千，增加人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

宋太祖：严禁“高考移民”

杨坚父子在中国古代户口管理的制度建设方面功不可没，除了搞“有图有真相”，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史称“本贯应举之制”，“本贯”就是“户籍在本地”之意，“应举”即“参加科举考试”，套用现在的话说：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十一月,宋太祖下诏规定了三项内容:一是考生一律在有户籍的本贯州府参加考试;二是不准以寄居他州的名义应试;三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在其基本原则指导下,科举制中的户籍要求贯穿于科举的全过程,

应试考生报名,要向州府递交状纸,上列姓名、乡贯、三代情况等内容。地方官据此进行审查,其中乡贯的户籍要求很严格。据《贡举条例》,仅有户籍还不行,须实际居住在本贯才合格,“虽有户籍久离本贯者”(虽然有本地户籍,但长时间不在本地居住),则要有命官担保方可。在开封府应举的户籍规定更严,天圣七年(1029年)改为须有户籍七年以上并实际居住“即许投状”。

宋真宗:城里人交钱,乡下人出力

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考证,北宋崇宁时(宋徽宗赵佶的年号,共5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

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治理碰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太多,不轻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城市居民)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

自西周,有户籍制度雏形以来,政府征税的依据一是人口二是土地,农民的经济生活

相对最简单,地方政府收取赋税和派遣徭役,操作程序也简便。然而,城市中的居民,其财产类型多样,房舍、店铺是有形的,而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以货币形式存在的个人财产,是无法统计的。

针对这种情况,北宋专为城市居民单独造户籍,根据核查到的财产分成若干等,税种也多样,比如宅税(类似今天的房产税);地税,指城市店宅地基税(类似今天的土地税)。盐钱,以及临时摊派。这些税种都以货币形式征收,所谓“出钱”;而农村,主要征发徭役和兵役。

朱元璋:离家百里,先得申请通行证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

为了让农民安心耕田,朱元璋制定了“路引制度”。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路引相当于通行证,需要向官方申请。没有路引,就不能随便离开土地,这种制度将农民的行动限制在很小的范围。

明朝中期开始出现了太监直接管理、收税的皇庄,这样就出现了大规模强占土地的问题。明孝宗年间,有皇庄四处,官田不到两千顷,后来逐渐发展到五处皇庄,占地一万二千八百顷。明武宗年间,皇庄增加到三十六处,占地五万三千多顷。

皇室开皇庄占地之风,其他皇亲贵戚纷纷仿效。据《明会要》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田地总数是八百五十(转至42页下)



孔子有时也说谎

孔子，名丘，字仲尼，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是个有大学问的大圣人，但有时候“需要”了，他也会说谎。

台湾学者曾仕强教授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授《易经的奥秘》时，说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有一天，孔子的一个学生在门外扫地，来了一个客人问他：“你是谁呀？”他很自豪地说：“我是孔老先生的弟子！”客人说：“那太好了，我能不能请教你一个问题？”学生很高兴地说：“可以呀！”

客人问：“一年到底有几季啊？”学生心想，这种问题还用问吗？于是便回答道：“春夏秋冬四季。”客人摇摇头说：“不对，一年只有三季。”“哎，您搞错了，四季！”“三季！”最后两个人争执不下，就决定打赌：如果是四季，客人向学生磕三个头，如果是三季，学生向客人磕三个头。

恰好孔子正从屋里走出来，学生向前问

道：“老师，一年有几季？”孔子看了一眼客人，说：“一年有三季。”这个学生快吓昏了，可是他不敢马上问。客人马上说：“磕头，磕头！”学生没法，只好乖乖地磕了三个头。

客人走后，学生迫不及待地问：“老师，一年明明有四季，您怎么说只有三季呢？”

孔子说：“你没看到刚才那个人全身都是绿的吗？他是蚂蚱，蚂蚱春天生，秋天就死了，他从来没有见过冬天，你讲三季他会满意，你讲四季吵到晚上都讲不通。你吃点亏，磕三个头，无所谓。”

曾教授讲完这个故事后说，碰到那些不讲理的人，你就会想到他是“三季人”，就不往心里去了，你还会生气吗？

是的，没有必要与这种人生气。因为，大凡“三季人”都是不讲理的，如果你不“说谎”让他一着，势必无休止地争吵下去，你会耽误不起那个闲工夫，把宝贵的精力和时间毫无意义地浪费掉！

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减至四百二十二万顷，这减少的一半就是被皇亲贵戚们兼并了，所以这些数字都不在官册。

土地的大量被兼并，使得无数农民无地可种，从而流离失所，又因为明朝的路引制

度，这些流亡到外地的农民被官府追捕，自然而然成了所谓的“流民”。每逢饥荒横行，便是流民四起之时，大明朝成了名副其实的“流民帝国”。

宋代为什么有那么多黑店

宋代文学中有很多关于黑店的记载,其中最为著名的黑店要数孟州道母夜叉孙二娘经营的十字坡酒店。在《水浒传》第二十七回《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中讲道,孟州道十字坡酒店白天看上去是经营酒食和供食客休息的客栈,实则却是专门在夜间劫掠客商,杀人并卖人肉包子的一家黑店。当时在江湖上盛传:“走到十字坡,客人谁敢那里过?肥的切做包子馅,瘦的却把去填河。”说的就是孙二娘和张青经营的十字坡客栈是一家远近闻名的黑店。书中还写道,当张青引领武松来到人肉作坊里时,只见“壁上挂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五六条人腿:见那两个公人,一立一倒挺着在剥人凳上”。我想,读者看到这样绘声绘色的描述,一定会觉得人肉作坊是个恐怖至极的地方。

北宋彭乘所写的《续墨客挥犀》中记载了一个关于黑店的故事,在荆南一带有一个受人敬仰的僧人,他走路非常慢,而且还要由两名侍者搀扶着,不但迈着很小的步子,而且还要喘息几次才可以走一步。大家都尊称他为“慢行和尚”。在一年的元宵灯节晚上,官府捉到一个越墙入室强奸妇女的窃贼,摘去面罩发现此人竟然是让人敬仰的慢行和尚,此事令众人皆叹。后来慢行和尚被责罚后蓄发还俗,不久他便在市井中开店做起了生意,而且与以前大不一样的是,他竟然行步如风。南宋洪迈所撰的《夷坚志》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有些旅店的老板其实就是打家劫舍的强盗。在青州(今山东青州)离城 30 里一带,设有一

个旅店,那些携带行李并且独自一人留宿的客人多数都会被店主杀害,收取钱财之后投尸于白沙河内,在此地不知有多少人都惨遭杀害。鉴于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人利用开店作为掩护而胡作非为。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宋代旅店中,图财害命的刑事案件屡屡发生。《夷坚志》中记载了在江南西路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境内有一户人家,男主人是一个屠夫,经常杀害行旅之人:“伺客熟睡,则从高以矛楯其腹,死则推陷穴中,吞略衣装,续剖肉为脯,售于墟落。”这个故事中讲到的屠户也是打着旅店的幌子在图财害命,并将人肉晒成干再售出去。还记载了江南东路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永丰乡民胡廿四。在大梅岭开有一家旅店。旅店后面的花圃中有一个洞穴,旅店主人在树根处挖了一条隧道直接通向客房,每日待客人熟睡之后,便“以巾缚客口,倒曳缚窖中,生埋之”。史料记载,宋代民间的旅店设立较为广泛,而且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镇。都有很多旅店。据南宋周必大《文忠集》记载,他在回故乡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的路上,在衢州江山县(今浙江江山)礼贤镇见“途中邸店颇多”。宋代人口流动很大,再加上官员、商贩等各个阶层的人都在路途奔波,所以他们对自己的人身安全还是十分担忧的,而这类有关黑店的故事也是越传越广,在文学作品中自然也就少不了关于黑店这一片段的描述。但这些黑店是借助于《水浒传》的广泛流传而成为家喻户晓的行侠仗义之所的。

省地方志办公室巡视员焦博武一行 来西安调研地方志工作

5月27—30日，省地方志办公室巡视员、机关党委书记焦博武一行赴西安市开展地方志工作调研。西安市地方志办工作主任冯艳阳汇报了西安市在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的做法、意见和建议，以及近几年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在市志、年鉴、区县志、地情资料、旧志整理以及地情信息等方面的工作成绩。随后在市地方志办副主任姚敏杰和张帜的陪同下，先后赴西安市部分区县，就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开展第二轮修志、年鉴编纂工作，地方志工作创新做法、存在的难点及对策和地方志队伍建设、文化建设的成效、问题与建议等问题开展了调研。

焦博武一行先后到高陵、临潼、长安、周至、莲湖等5个区县，深入区县地方志工作实际，听取区县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人工作汇报，与地方志编纂一线人员进行深入交流，实地查看修志工作成果，传达学习全国第五次地方志工作

会议精神，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基层地方志修志机构、人员配置以及工作状况。

调研中，焦博武充分肯定了西安市地方志工作。他认为，西安市地方志工作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能够迅速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尤其是近几年出版了《西安历史大词典》《长安志》《西安府志》等很多大众喜闻乐见的地情资料丛书，促进了地方志工作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区县地方志工作在克服人员编制等困难下也能够稳步开展，能够按照全省区县二轮修志工作安排部署开展工作，总体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对今后工作，焦博武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继续加强地方志工作条例贯彻落实，尤其是在区县一级；二是要认真贯彻落实好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加快二轮修志工作步伐；三是要认真总结修志工作经验，进一步推动地方志工作持续发展。

西安市第二轮 修志工作分类培训会召开

2014年,《西安市志(1991—2010)》全面进入分志总纂阶段,为进一步加快各分志总纂进度,高质量完成总纂任务,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于5月19至23日在未央湖大酒店召开西安市第二轮修志工作分类培训会。培训采用集中授课和分组讨论的方式,分3期进行,每期2天。共有134家承编单位的144名主编、主笔参加培训。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高度重视此次培训,省志办主任王锦春、市县志处处长张世民到会参加开班仪式并指导工作。

市志办冯艳阳主任携市志办领导班子成员参加开班仪式并主持会议。冯主任首先代表市志办向前来参加培训的主编、主笔表示欢迎和谢意,然后简要介绍了4月份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及我市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相关情况。最后强调:质量是志书的生命,此次培训会就是要从两个层面解决质量问题,一个是专家从方志技术层面解决;一个就是市志责编与主编、主笔一对一的每个分志进行探讨。希望通过培训和各位修志人员的辛劳付出,二轮《西安市志》能够成为良志、佳志;希望地方志能够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省志办王锦春主任在讲话中首先肯定了

市志办举行此次培训的积极意义。他指出:修志是政治性、技术性、战略性很强的工作,优秀的志书需要高素质的修志队伍,而高素质的修志队伍就需要经过培训,尤其是这样有针对性的分类培训。同时,他希望这次培训不仅仅是一次学习的机会,还是一次交流的机会、一次提升的机会。他要求参会主编、主笔珍惜机会,为以后的工作奠定基础。在讲话的最后,王主任祝各位修志人员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好工作,天天充实;好好生活,天天快乐。

集中培训由市志办张帜副主任主持,他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端正态度、调整思路;二是要善于学习、勇于检讨;三是要善于交流、敢于亮丑;并重申了4月17日在《文物分志》评审验收观摩会上的讲话“修志工作依法而为,这是我们各单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希望承编单位站在为国修志、为民立言、为事业树碑的高度认识修志工作,科学安排、责任到人、保障到位,确保于今年年底之前圆满完成分志总纂任务。”

培训中,省志办原巡视员,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编审董健桥和《文物分志》主编、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自力两位专

家授课。王自力以《文物分志》编修过程为例,从写稿者的角度向参会的主编、主笔介绍了《文物分志》从开始编修到通过分志审稿在行政推动和志稿技术处理上的一些做法和经验,董健桥则以审稿者的角度将审稿过程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尤其是目前上报稿件中存在问题较多的概述、无题序展开辅导和点评。

在分组讨论时,各分志责编与主编、主笔们就分志总纂进度、上报稿件中存在的问题、下一步工作的开展等内容进行了交流。通过对部分篇目结构调整细化、缺失条目补充、分志总纂与衔接、交叉问题处理等内容的进一步沟通,明确了修改方向和完成时限,工作思路更加清晰。研讨中发言踊跃,氛围良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西安通史》启动仪式暨初稿研讨会举行

6月20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举行《西安通史》启动仪式暨初稿研讨会。市志办主任冯艳阳、副主任姚敏杰以及相关同志,《西安通史》编著者黄留珠教授等专家学者参加。

会议就《西安通史》内容选择、资料取舍、撰写方法、行文风格等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大家一致表示,要将《西安通史》编著成一部连续性、权威性、学术性相统一的精品。

《西安通史》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西安历史发展的多卷本通史性著述。时间范围:自原始社会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地域范围:今西安市行政所辖区域(个别特殊问题可适当超出),《西安通史》计划为四卷本,内容分作八章。每卷字数控制在30万字左右,总共约120万字左右。预计2015年完成。

《西安通史》由西北大学博导、陕西省文

史研究馆馆员、著名历史学家黄留珠教授领衔,以西北大学中青年教授、博士为主体,并适当吸纳西安其他高校及科研单位的研究者组成。



大家闺秀与 小家碧玉区别



不同的家境培养出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不同的性格。大家闺秀的气质沉稳,眉目疏朗,喜怒哀乐不全形于色,待人接物礼貌周全,在社交场合大方有度,知书达礼,赢得长辈的称赞,同辈的欣赏。而小家碧玉呢?长的也许俏丽,性情也许温柔,性格也许活泼,在大场面里,两眼一闪一闪的露出惊喜的神态,动作有些拘谨,楚楚动人。让男人陡增“护花”的勇气。

大家闺秀由于所受的教育程度比较高,从小就受到比较严格的行为的约束和礼教的规范,她自视甚

高,一般不会主动示爱,文绉绉地以诗传情,烈焰奔腾在暗流之下;而小家碧玉则没有那么多的沟坎门楣的羁绊,很实际的一招一惹,使一下小性子,将男人头脑搞得不由自主的晕晕乎乎。这样大家闺秀得到了所谓的“柏拉图”之爱,而小家碧玉则享受着凡俗尘世的爱情。

一个从小就生活在和谐的家庭气氛中,活动空间宽敞的知识氛围中女孩,她们见多识广,知识丰富,在她们的脸上就呈现出大家之气。反之则不然。小家碧玉最大的特点是“秀而不媚,寒而不清”。

“南墙”是什么墙

日常俗语中的“不撞南墙不回头”,比喻认死理,听不进不同意见,这里的“南墙”到底是指什么墙呢?

中国古代房屋的方向大都是坐北朝南,大门一进来还有一堵墙,叫照壁、照墙或影壁,不仅可以遮挡外人的目光,而且从风水角度来说,还可以阻拦直来直去的气流。这堵墙就是“南墙”,从正房门出来向外走时,必须避开这堵墙绕着走,否则就会一头撞上。所谓“不撞南墙不回头”,就是讽刺那些不知道绕道而行、认死理的人。

照壁或曰南墙,最早的时候称作“萧墙”。《论语·季氏》:“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颛臾:鲁国的附属国。郑玄解释说:“萧之言肃也,墙谓屏也。君臣相见之

礼,至屏而加肃敬焉,是以谓之萧墙。”原来“萧”通“肃”,“萧墙”就是国君的宫室内作为屏障的矮墙,面对大门,像一扇屏风,因此又称“塞门”和“屏”。臣子到了这扇门,一想起将要见到国君,立马肃然起敬,故称“萧墙”(肃墙)。所以孔子所说的“萧墙之内”就是指宫内,当政的季氏打算讨伐颛臾,孔子担忧季氏的祸患不在颛臾,而是在他的宫室之内。后人于是就用“祸起萧墙”这个成语比喻内部的祸患。

民间仿照宫内的“萧墙”形式也建起了照壁,不过已经跟“萧墙”的原意大相径庭,“至屏而加肃敬”的含义消失了,而代之以“鬼碰头”的民间禁忌,意谓建起这堵墙就阻断了鬼的来路。

『杜撰』与『杜』姓

“杜撰”这一词义,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没有根据的编造,虚构。但是,“杜撰”这个词语与姓杜的人有关,而且还是姓杜的人撰写出来的东西。

“杜撰”这一词起源于唐五代,与杜光庭有关。杜光庭(850—933年),字圣宾,号东瀛子,浙江缙云人。唐懿宗时,考进士未中,后到天台山入道。杜光庭精通儒、道典籍,在四川做道士时,出于维护道教的目的,编撰神话故事阐扬道教,存世的有《灵异记》《神仙感遇记》《墉城集仙记》等;对道教仪则、应验方面的著录有《道德真经广圣义》《道门科范大全集》《广成集》等。《道藏》收录其著作 27 种,200 余卷,其中有很多是神仙怪异的内容,属于胡编乱造。由于是杜光庭所编撰,因此后世对于没有事实根据而胡凑的著作,叫做“杜撰”。

还有一个姓杜的人撰写出来的东西称“杜撰”也颇为流行,这个姓杜的人叫杜默。杜默(1019—约 1085 年),字师雄,安徽和县人,北宋著名歌豪,他与诗人欧阳修、石延年相处甚密。其师石介作诗曰:“曼卿豪于诗,永叔豪于词,师雄歌变豪,三人宜同称。”故有“三豪”之称。可是豪于歌的杜默也喜欢诗,有一次,石介和欧阳修在开封为再次名落孙山的杜默设宴告别,席间诗酒唱和。杜默在答谢诗中写道:“一片灵台挂明月,万丈词焰飞长虹;乞取一杓凤池水,活取久旱泥蟠龙。”诗句可算豪放。但有人说此诗后两句重复用了“取”字,犯诗家忌讳。杜默对此不接受,他说那是死守陈规陋习,而诗贵在意境,决不能以词害意。因此,人们以后见到他的诗就说:“这是杜默所撰。”南宋王楙《野客丛书·杜撰》曰:“杜默为诗,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为杜撰……然仆又观俗有杜田、杜园之说,杜之云者,犹言假耳。”

再后来,人们把不着边际、胡编乱造的东西都称为杜撰。尽管有些东西不是姓杜的人撰写,但是“殊途同归”,与杜光庭、杜默的“杜撰”堪称“一脉相承”。

房东的东是何意

中国自古把“东”看为最重要的方向,所以在中国传统建筑格局中的东房就是上房。中国的传统房屋一般都是主屋为“坐北朝南”,在主屋的前面两侧,有东西向的厢房,主屋的东面房间就是上房,在这间屋子里住的人都是房子的主人或家中最权威的人,上房连晚辈和下人都不能住,就更不要说是出租

给外人住了,所谓的“房东”就是住在东首上房的人。

在《礼记》中的《曲礼篇》记载:“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客若降等,则就主人之阶。主人固辞,然后客复就西阶。”从文中可以看到“东”位就是代表主人。后来,“房东”演变为出租或出借房屋的主人。

死党原来是个褒义词

现在，许多年轻人喜欢把最好的朋友称为自己的死党。按说，中国人十分忌讳“死”字，认为很不吉利，可是，为什么会把最好的朋友称为死党呢？

原来，死党这个词很古老。其最早出处在《汉书·翟方进传》，“案后将军朱博、钜鹿太守孙闳、故光禄大夫陈咸与立交通厚善，相与为腹心，有背公死党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后已。”唐代颜师古注解道：“死党，尽死力于朋党也。”文中提到的三人都是西汉名臣，皆有忠名，尤其陈咸抗拒王莽篡位，不仅自己辞官，还责令三个儿子也辞官。如此看来，死党最早还是个褒义词。死，是动词当名词用，有“为什么赴死”之意，党乃朋党，古时士大夫结成利益集团，被指为朋党。

后来，死党渐成贬义词，指为某人或集团

出死力的党羽。宋代陆游的《南唐书·陈觉传》说：“逾年，（陈觉）复起任事，始与徵古为死党，相倡和如出一口。”而《宋史·奸臣传三 秦桧》也说：“浚（张浚）在永州，桧（秦桧）又使其死党张炳知潭州。”陈觉与冯延巳、魏岑、查文徽、冯延鲁五人被称为南唐的“五鬼”；而秦桧就更不用提了，是南宋最负盛名的奸臣。死党跟这些奸臣一起“捆绑”，当然难逃成为贬义词的命运。

至于现代人用的死党一词，则多是贬词褒用。汉语中，褒词贬用常见，而贬词褒用却不大常见，但其更具语言张力。除死党外，像齐白石崇拜徐渭、朱耷和吴昌硕，曾经作诗道：“我愿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走狗是典型的贬义词，白石老人这样写就是贬词褒用，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解字·

“皮”



这个“皮”字是个会意字。金文①的左边是一把长柄平头的铲刀，刀柄的右侧还有一个铁环，右下侧是一只手，也就是说，手拿平头铲能剥兽皮。小篆②的形体发生了伪变，只是手的部分还仍然保留着，至于平头铲的形状根本看不出来了。④是楷书写法。

“皮”的本义就是兽皮，如：“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左传·僖公十四年》）也就是说：连皮都没有了，皮上的毛将在哪里附着呢？由“兽皮”，又可引申为物体的表面之义，如：“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史记·酈食其传》）这里的“相”当“看”讲，也就是说：只从表面看，恐怕全天下的能人都会失掉的。

请注意：皮、革、肤三个字在古代的词义是不同的。皮和革都是指“兽皮”，不过带毛的叫“皮”，去掉毛的叫“革”。“肤”字则是专指人的皮肤。

「牺牲」为何 特指为正义献身

中国汉字文化博大精深,形容死,就有亡、故、卒、薨、崩、歿、去世、仙逝、殒命等很多字眼。对于英烈之死,大多则用“牺牲”二字。那么,为正义事业而献身为什么叫“牺牲”呢?

在中国古代,由于死者的身份、地位不同,其“死”的叫法也各不相同。据《礼记·曲礼下》记载:“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不过,后来

随着时代发展,这种情况也逐渐有所变化,其限制也不再那么严格。唐代时,二品以上官员死称薨,五品以上称卒,自六品以下以至平民百姓都称死。清代皇室成员中,皇帝、皇后和

皇太后等亡故称“崩”,皇贵妃以下到嫔、王、公、侯、伯的世爵之死称“薨”。

用“牺牲”来表示为坚持信仰而死、为正义事业而献身,是从近代开始的。其实,“牺牲”二字在古代是指祭祀或祭拜的用品。色纯为“牺”,体全为“牲”。在中国古代,“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所以古人对祭祀之事非常重视,不但制定了严格、复杂的礼仪规制,对于祭品也有着严格的规定。用于祭祀的牲畜必须要用纯色,而且必须是完整的,只有纯色、完整的禽畜,才能叫“牺牲”。后来,牺牲的含义逐渐宽泛,也用来泛指用其他动物所做的祭品了。

正是由于牺牲最初是用作祭祀的,这些祭品是在舍弃自己生命而为大家祈福,牺牲一词后来遂渐渐地被人们赋予了高尚的内涵,有了自我奉献的意思。

建都西安第一个建立四字年号的皇帝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四字年号的皇帝是汉哀帝。汉哀帝刘欣于公元前7年即帝位,于公元前5年将年号“建平”改为“太初元将”四字年号,在此之前各代皇帝年号均为二字。

太初元将(前5年六月一八月)是西汉时期皇帝汉哀帝刘欣的第二个年号,共计3个月。这个年号也是首次使用四个字的年号。

建平二年(前5年)六月夏,贺良等以讖纬之言,说汉朝要中衰,应该改元易号,重新受命。于是汉哀帝下诏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同年八月,汉哀帝以其言无验,下诏曰(《资治通鉴·卷第三十四》):“待诏

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信道不笃,过听其言,冀为百姓获福,卒无嘉应。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六月甲子诏书,非赦令,皆蠲除之。贺良等反道惑众,奸态当穷竟。”

于是又改回建平二年。

有些史书中没有“元将”两字,只写作太初元年。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后人不知道是四个字的年号,以为错误而删除“元将”两字。在更早的史书(《汉书》唐本)中有“元将”两字。有些史书中没有“元将”两字,只写作太初元年。



《穆天子传》

西安古代后妃中 第一个有谥号的人

建都西安中国古代王朝中第一个有谥号的后妃是周穆王的美人盛姬。盛姬死后，周穆王非常伤心。下令以皇后礼安葬，并给盛姬以“哀淑人”谥号。这是我国谥号之始，也是西安历史上第一个有谥号的后妃。谥号是皇帝对一些人死后，根据其生前作为所赐加的称号。这种谥号大多有褒奖的含义在内。

《穆天子传》用了大量篇幅介绍了如何给盛姬办丧事的事，盛姬葬礼很风光。便把她葬于沂山东南，因为这里是证明他们爱情的地方。盛姬所葬之地因穆王而名，称为穆陵，后人于此筑关，称之为齐长城第一雄关穆陵关。

后来，周王、诸侯生有尊号，死后避讳其名，循其例而另起美称，谥法就此产生。谥号

代替了死者的名字，所以谥法又叫做易名礼、更名典。西周时，赐谥权完全掌握在周王朝的手里，周天子有谥，诸侯有的赐谥，有的无谥。春秋以后，周王室衰微诸侯强大，陪臣执国命，谥法出现了变化，诸侯的谥号不再请天子赐封，而由其子和大臣议定。一般卿大夫甚至贵夫人也有谥号，社会上还出现了私谥。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禁止后人的议论和批评，下令废除了谥法。皇帝名称按世代计算，称始皇帝、二世皇帝、直至万世皇帝。

西汉初年，谥法恢复，自汉到晋，谥法逐渐严密。南北朝时，各民族政权建立，给谥法增添了新内容，唐宋时，谥法发展鼎盛。



国风·秦风·蒹葭

——《诗经》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赏析】

东周时的秦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大部及甘肃东部。其地“迫近戎狄”，这样的环境迫使秦人“修习战备，高尚气力”（《汉书·地理志》），而他们的感情也是激昂粗豪的。保存在《秦风》里的十首诗也多写征战猎伐、痛悼讽劝一类的事，似《蒹葭》《晨风》这种凄婉缠绵的情致却更像郑卫之音的风格。

诗中“白露为霜”给读者传达出节序已是深秋了，而天才破晓，因为芦苇叶片上还存留着夜间露水凝成的霜花。就在这样一个深秋的凌晨，诗人来到河边，为的是追寻那思慕的人儿，而出现在眼前的是弥望的茫茫芦苇丛，

呈出冷寂与落寞，诗人只知道所苦苦期盼的人儿在河水的另外一边。从下文看，这不是一个确定性的存在，诗人根本就不明伊人的居处，还是伊人像“东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的“南国佳人”（曹植《杂诗七首》之四）一样迁徙无定，也无从知晓。这种也许是毫无希望但却充满诱惑的追寻在诗人脚下和笔下展开。把“溯洄”“溯游”理解成逆流而上和顺流而下或者沿着弯曲的水道和沿着直流的水道，都不会影响到对诗意的理解。在白居易《长恨歌》中，杨贵妃消殒马嵬坡后，玄宗孤灯独守，寒衾难眠，通过道士鸿都客“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找，仍是“两处茫茫皆不见”，但终究在

“虚无缥缈”的海外仙山上找到了已成仙的杨贵妃,相约重逢于七夕。而《蒹葭》中,诗人一番艰苦的上下追寻后,伊人仿佛在河水中央,周围流淌着波光,依旧无法接近。《国风·周南·汉广》中诗人也因为汉水太宽无法横渡而不能求得“游女”,陈启源说:“夫说(悦)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说益至。”(《毛诗稽古编·附录》)“可见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即,加深着渴慕的程度。诗中“宛”字表明伊人的身影是隐约缥缈的,或许根本上就是诗人痴迷心境下生出的幻觉。

以下两章只是对首章文字略加改动而成,这种仅对文字略加改动的重章叠唱是《诗经》中常用的手法。具体到此诗,这种改动都是在韵脚上——首章“苍、霜、方、长、央”属阳部韵,次章“凄、唏、湄、跻、坻”属脂微合韵,三章“采、已、涣、右、浊”属之部韵——如此而形成各章内部韵律协和而各章之间韵律参差的效果,给人的感觉是:变化之中又包含了稳定。同时,这种改动也造成了语义的往复推进。如“白露为霜”“白露未晞”“白露未已”——夜间的露水凝成霜花,霜花因气温升高而融为露水,露水在阳光照射下蒸发——表明了时间的延续。

此诗曾被认为是用来讽刺秦襄公不能用周礼来巩固他的国家(《毛诗序》、郑笺),或惋惜招引隐居的贤士而不可得(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但跟《诗经》中多数诗内容往往比较具体实在不同,此诗并没有具体的事件与场景,甚至连“伊人”的性别都难以确指。上述两种理解也许当初是有根据的,但这些根据或者没有留存下来,或者不足以服人,因而他们的结论也就让人怀疑了。《诗经》的历代注家往往是求之愈深,却得到

失之愈远的相反结果。况且“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见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科林伍德《历史观念》),对文本的阐释也具有当代性。现代大多数学者都把它看作是一首情诗。

诗意的空幻虚泛给阐释带来了麻烦,但也因而扩展了其内涵的包容空间。读者触及隐藏在描写对象后面的东西,就感到这首诗中的物象,不只是被诗人拿来单纯地歌咏,其中更蕴育着某些象征的意味。“在水一方”为企慕的象征,钱钟书《管锥编》已申说甚详。“溯洄”“溯游”“道阻且长”“宛在水中央”也不过是反复追寻与追求的艰难和渺茫的象征。诗人上下求索,而伊人虽隐约可见却依然遥不可及。《西厢记》中莺莺在普救寺中因母亲的拘系而不能与张生结合,叹惜“隔花阴人远天涯近”,《蒹葭》中的诗人也许是同样的感觉。

诗人的追寻似乎就要成功了,但终究还是水月镜花。古希腊神话中有一则说坦塔罗斯王因自我吹嘘犯下罪过而遭受惩罚——忍受永远的焦渴和饥饿之苦。他站在大湖中,湖水深及他的下颌,湖岸长着果树,累累果实就悬在他的头顶。可是,当他口渴低头喝水时,湖水便退去;当他腹饥伸手摘果时,树枝便荡开,清泉佳果他始终可望而不可即。目标的切近反而使失败显得更为让人痛苦、惋惜,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失败是距离成功仅一步之遥的失败。

探索人生深刻体验的作品总在后代得到不断的回应。“蒹葭之思”(省称“葭思”)、“蒹葭伊人”成为旧时书信中怀人的套语。曹植的《洛神赋》、李商隐的《无题》诗也是《蒹葭》所表现的主题的回应。而当代台湾通俗小说家琼瑶的一部言情小说就叫做《在水一方》,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就是以此诗为本改写的。



西安地铁赋

◎ 姚敏杰

若夫盘古开天，但闻传说之篇；奇人遁地，仅见神话之章。车马长安，见载群籍，炫皇族之声威；地铁西安，誉满众口，显兆民之祯祥。溯乎文谟武烈，建都翦商；秦皇汉武，拓土开疆；大唐皇帝，狩猎巡防。其行也，悉赖乎土路石蹬，栈道飞梁，步行远足，车马舟航也。

至如今之西安，城扩数倍，难缓交通拥堵；人近千万，何谈道路顺畅？几成梦魇，市民惟苦出行；倡建地铁，有司纾解民伤。掘地数仞，铺铁轨于隧道；历时五年，通列车于长廊。回想执事之初，伟业甫创：栉风沐雨，凿坚摧刚；科学规划，清碍除障。盾构施工，务求国内一流；文物保护，志创业界辉煌。嗟夫！魂牵古城，痴情今世难了；梦萦地铁，夙

愿一朝得偿！

序排二号，南北主线首通：入北客站，穿古城墙，逾南稍门，出航天城，终南翠微旋可迷眼；次列一号，东西廊道既成：下纺织城，历通济坊，越玉祥门，抵后卫寨，森林花草幽然飘香。每临入口，叹创意之时尚；置身站内，觉富丽而大方。灯火通明，恍入广厦商场；设施精良，犹在富贵仙乡。漫步游目，品鉴艺术橱窗；伫足骋怀，雅赏文化之墙。噫嘻！福荫西京悠远，秦岭巍巍；泽润古都绵长，渭河泱泱。地铁西安，开来继往；提速古城，缓堵保畅。愿景丕现，公交描绘枢纽；宏图大展，地铁规划布网。建宜居之都市，惠风和畅；赞大美之西安，凯歌飞扬！

群公诗咏西安地铁

◎ 姚敏杰

2011年9月16日,随着地铁二号线的开通运营,西安这座有着一千多年建都史、三千多年建城史的古老城市,名副其实地进入了地铁时代。时隔两年后的2013年9月15日,一号线开通运营,西安地铁可以实现换乘。然而,偌大的西安城仅仅能够东西南北“走四方”,岂可满足人们四通八达、闹市遐趣的出行需求?西安需要地铁网络,地铁建设,任重道远。在西安地铁始运营即将迎来三周年纪念日之际,我利用周末闲暇,专门乘坐地铁出行,感受地铁带给广大市民的方便和快捷,憧憬西安地铁成网后的美妙前景,喜悦之情难禁,遂赋歪诗一首。继而突发奇想,若能发动文朋诗友力量,吟咏西安地铁,造成一些宣传声势,岂不美哉?

心动不如行动。本人不揣浅陋,将自己所写《西安地铁》绝句通过手机信息发给几位诗家,很快得到响应,和诗纷纷发进我的手机,令人感动。和诗者多是叱咤西安诗坛的高手,所作虽称“和诗”,但却均能自出手眼,不落俗套,原作抛砖引玉之功毕显。现将拙作《西安地铁》和依时间顺序陆续发来的和诗照录如次,以飨读者:

西安地铁

姚敏杰

穿越汉唐穿越秦,东坊走过复西津。
飞驰城下无牵绊,尽载寻常追梦人。

和姚公敏杰地铁绝句

刘炜评

纵横驰道挽三秦,锦绣西京居要津。
更喜民生新局面,一城俱是御风人。

读敏杰友《西安地铁》诗次韵奉和

赵安志

生在陕西我爱秦,金虬载梦渡长津。
凌波碾浪无笼绊,唱赋吟哦和友人。

步姚公咏西安地铁

王 锋

地底飙轮似老秦,车犹龙也向关津。
轰隆日夜驰驱处,有限乾坤无限人。

西安地铁并和王锋兄

彭世团

地铁飞地震大秦,始皇惊问汗津津。
飞来禀报宽心意,直道穿城尽匠人。

次韵姚公咏西安地铁

吴 嘉

誉满寰中越故秦,博通经史复通津。
一朝再筑皇都梦,地底龙吟唤世人。

依韵和《西安地铁》

郭冀宁

地底游龙潜入秦，遥接泾渭控九津。
纵横唐汉英雄气，天策千秋能几人？

拟古风戏和姚敏杰

马河声

地下城阙辅三秦，掌上风烟望五津。
城阙化作蛟龙飞，风烟梦幻逍遥人。

拟古风和姚敏杰咏地铁诗

怀玉堂

南风北龙吞渭水，西围东望越灞津。
穿越古今承坦途，丝路花开长安人。

依韵和《西安地铁》

周谊平

驰骋西咸建大秦，通衢城下亦平津。
长安百姓乘龙驾，方便小康忙碌人。
(西咸：指西安咸阳经济建设一体化。)

依韵和《西安地铁》诗

奇 奇

一霎秋光一霎春，飞驰四季可称神。
满车皆是寻常客，个个却蹬风火轮。

依韵和《西安地铁》诗

王小凤

车轨洞穿秦汉地，坦途一路越关津。
窗前小站风姿绰，半是传说半是真。

和姚敏杰先生咏《西安地铁》

王彦龙

春风春雨润三秦，双线横通要路津。
君自东来我北去，西京遍是土行人。

《西安地铁》三首

张世民

偶见西安市志办吾友姚敏杰君所作《西安地铁》，众人知之，余亦步其后，不嫌冒昧粗疏，贻人谈资耳。

一

游龙行地不厌秦，水作漩涡难问津。
且吐且吞且蛙泳，如真如幻如造人。

二

道是强龙不压秦，一举穿梭实要津。
东西南北登时抵，上下左右地中人。

三

伏脉千年始出秦，云龙变化资要津。
地底革命君莫问，泉壤无际猎梦人。

